《大跃进•苦日子历史研究丛书》

大 跃 进 · 大 饥 荒

历史真相、过程与断代史探究

作者：余习广

网络版首发于凯迪网络•猫眼看人

作 者 自 述

余习广： 原籍燕赵，长于湖湘，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原中央党校教师。自称“当代中国有良知的共和国史学家”。 主持“共和国上书史”系列、“大跃进•苦日子研究” 系列、“大跃进•苦日子百县典型调查” 系列、“文革重大武斗血案大典”系列、“文革造反夺权大典”系列诸丛书；参与发起主持 600 万字的《文化大革命辞典》；著作有《擎起共和国圣火：从右派囚徒到国策死刑犯之路》等。 常以太史公风范自勉，常以以商养文自得，常以还历史真相自诩的一介书生而已。

目　　录

[注1] 作者说明：因考虑到出版商对出书版权的要求，以下发简略本。

代 前 言

大跃进“始作俑者”心理动机探秘

起于 1957 年底的那场大跃进，给亿万中国人带来了一场无情的大灾难！

毛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施以“机关枪、迫击炮及其他”的火力攻击时，曾经怒发戟指地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其无后乎？”

祸起于莫斯科会议后毛泽东“超英赶美”压苏联、与赫鲁晓夫争霸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的“雄心壮志”，和由此而来抢先于苏联，“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梦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把中国社会拖进了灾难深重的苦海。

1958 年 1 月 11 日，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大批周恩来的“反冒进”时，他气势摄人地借题发挥了一通：“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毛泽东一股作气应承下来，并以此洋洋自得地大谈起他心中的宏图伟略：大跃进！

大跃进是毛泽东狂热冲动的产物，是一场因“伟大领袖”个人好恶和性格而造成的民族大灾难！

1957 年 11 月的莫斯科之行，无疑是毛泽东心理冲动的巨大刺激：自建国以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在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粗鲁莽撞的机遇下，迅速膨胀为“超英赶美”压苏联，争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度狂燥焦虑状态！

南宁会议，体现了他不顾一切向前冲的决心；北戴河会议，正式吹响了人民公社化和“全民大炼钢铁”的进军号。什么大不列颠、美利坚，统统不在话下！“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三年建成共产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了毛泽东心中最富特色的口号。毛泽东的激情好象一把火，燃烧着整个神州。中国大陆陷入一场全民狂热的激情冲动之中！

以历史的眼光，平心静气而论，就毛泽东的心理特质，遇上鲁莽而又叛逆，大刀阔斧而又敢作敢为的赫鲁晓夫，真是他命中注定的不幸！引发起毛泽东晚年心理上纠缠不息又挥之不去两大梦魇的，就是这个苏联人！

晚年毛泽东心理障碍重重，寻根刨底，基本都能溯源于赫鲁晓夫行为所造成两大刺激：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全面破产，否定斯大林而引发的接班人危机。

1956 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揭发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巨大的社会震荡，波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布达佩斯“暴乱”，愤怒的群众捣毁了斯大林铜像……

毛泽东说：“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对于斯大林神像的坍塌，毛泽东也是有些私心窃喜，这是中国人伸张民族情怀的大好机遇。他说：“孙悟空甩掉了头上的金箍咒！”他在党内发起了一场关于斯大林对中共所犯错误的清算。

毛泽东不喜欢也看不起赫鲁晓夫这位鲁莽、冲动、夸夸其谈且狂妄自大的苏联领袖，他不能容忍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身后的批判，和由此将在中国引发的危机。他说：“个人崇拜还是要搞一点的。六亿多人口的中国，不搞一点个人崇拜，那还得了！”

在大唱“苏联为首”高调的同时，毛泽东以斯大林问题、国际共运中各国党的关系、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核时代是和平过渡还是战争、社会主义建设要赶超资本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上，向赫鲁晓夫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发起全面挑战。

但他心中有数，关键的问题还是经济实力。

11 月 7 日，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赫鲁晓夫激情洋溢地宣布，要通过和平竞赛，苏联在十五年内要赶上并超过美国。苏共领导人确定，从 1959 年内算起，在十二年内达到共产主义。

争强好胜、不甘人后的毛泽东闻风而动，11 月 18 日，在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更是慷慨激昂地向世人宣布：“中国人是很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

1958 年 8 月风起云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将中国大陆引向了“跑步进入共

产主义”的狂潮。毛泽东豪情勃发，激情似火，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争雄苏联，那是为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情，为了他领袖群伦的欲望，更是为了他从青年时代痴迷的“新村”主义演绎而来的那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梦想！

“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共产主义天堂！”人民公社的社会模式被创造出来后，毛泽东自认为是找到了他心中的“共产主义天堂”。人民公社被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新曙光”，“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结构”。

在两千多年历史的小农经济和皇权专制的中国，人民公社大有市场。

人民公社的“原教旨”指导思想是“一大二公穷过渡”，组织原则即军事共产主义，社会结构为共产、共食、共居的新村乌托邦。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并建立起公共食堂、托儿所、幸福院、缝纫厂，实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公社所有，建立起军事化共产主义体制。

这种军事化的国家农奴制，使得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的农民，成为国家农奴，并成为其最大限度榨取农产品的源泉，成为各级干部大搞“大兵团作战”，“争上游”、“夺红旗”、大跃进的工具，“五风”如洪水猛兽横扫中国大陆。所谓“五风”，即“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高征购风”及“强迫命令风”下的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和生活特殊化。

这一切使得中国大陆的广大农民彻底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加上时值秋收季节，又大搞“钢铁元帅升帐”，“九千万人大炼钢铁”，致使收割时节严重缺乏劳动力，各地普遍出现“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的情景。

到 1958 年底，丰年不丰收的各人民公社，就普遍陷入严重的饥荒。而 1959 年的春荒，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席卷整个中国大陆。据中共中央有关材料表明，至 1959 年 4 月底，全国因饥饿而发生浮肿、干瘦、胃肠道、妇女绝经、小儿严重营养不良、疳积、紫绀等严重病情，将近四千万人次，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湖北、四川、广西、广东等 15 个省普遍发生饿死人的情况。

无情的现实，迫使毛泽东逐渐清醒起来。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1958 年 11 月开始的 9 个月纠左工作，使得大跃进以来的社会危机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转。

1959 年 8 月，庐山风云，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在万言书中一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诘难，激起毛泽东歇斯底里的勃然大怒，一场“反右倾”、“更大跃进”势不可挡。从此，中国社会彻底改变了因面对困境而实施半年之久的调整方向，并由此陷入了长达三年之久而造成 5500 万人死难于斯的大饥荒和大灾难！

“反右倾”运动，在“打倒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同时，党内 370 余万敢于讲真话的正直之士被打成“右倾反党”分子，这还不包括在 9 月“鸣放”运动中远远大于此数的被动员起来“鸣放”而治罪的广大社员群众！

但是，毛泽东决不甘心承认失败，更不愿意为他所造成的失败承担责任。

当大饥荒来临之后，河南省最早向中央报告饿死人的原因时提出，“连续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因吃了不卫生的食物和不注意卫生，造成一些地方发生了死人情况”，毛泽东将此批转全国后，于是心领神会而又急于推卸责任的各省省委正好以此为由，在上报材料时纷纷效尤，以此为死人的缘由。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全国各省、地、县纷纷成立“防病治病领导小组”。

尽管赫鲁晓夫鉴于中国发生的严重灾难，主动提出希望中国暂缓还债的建议。面对惨败而恼羞成怒的毛泽东，记恨于赫鲁晓夫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不顾于大饥荒和大量死人的严峻现实，意气用事，硬是为了“争一口气”，还清外债。

为此，强夺饥民口中食，以高额征购任务，加重了那场灾荒的程度。毛泽东又一手挑起了中苏大论战，造成中苏交恶。“苏联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成为“伟大领袖”用民族矛盾掩盖国内危机、转移民众视线的有效口实。

于是，“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债”成为推卸 1960～1962 年大饥荒责任的理由，成为向全国人民推诿造成苦日子原因的最好解释！

与此同时，各级干部中迷途知返者为解民于水火倒悬，开始推行的“责任田”，与农民死里求生自发的“承包制”和“单干风”相呼应。随着中央一线领导人对于“好大喜功”、“头脑发热”、“专权独断”的“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失去信心，“阳奉阴违”，甚至“公然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路线”，实行起明智的政策调整。随着救民于水火倒悬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出台，中国大陆，终于逐渐走出困境，国计民生渐次有了起色，人民群众、尤其是亿万农民才有了填饱肚子的粮食。

然而，他人的成就必然会凸现其既往的错误，必须将以刘、邓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人置于万众唾弃的绝地！

为此，“伟大领袖”刻意进一步煽动起民众新的危机感，刘、邓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人，渐次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联系挂钩在一起。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批“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危言耸听地对深入人心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大举发难。他说，包产 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个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一边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了。他批评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利益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还愤愤不平地说，“赫鲁晓夫也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历来习惯于受人愚弄和臣服于强权而刚吃饱肚子的中国人民，被“两极分化”吓得胆战心惊，又将再次随着牧羊人手中的皮鞭，被轰赶进了新的危机和灾

难……

的确，大跃进是毛泽东自诩的“好大喜功”，狂热冲动的产物，也是从此以后毛泽东心中讳莫如深的疮疤。如果说此前毛泽东的心理动机，志在高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气概，要建千秋大业，立万世奇功；而自此以后，他心中感到受人以柄，危机四伏，惶惶不安，生怕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落到像斯大林那样身后被人否定的下场。

从而，一场新的运动，又在窥视着劫难丛生的中国！

回目录

导　　论

中国大陆，1957 年 10 月～1963 年秋，一个令人类良知受难、令人类历史蒙羞的时代！

风起于青萍之末，狂啸于长空大野，致山河泣血，民生塗炭，神州大地“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瑟鬼唱歌”！中华儿女全民啼饥号寒，5500 万人死于饥饿 [1]！即使按各省汇报的病、死人平均比例 6：1 而言，野菜等食物中毒、痢疾等肠胃疾病、严重营养不良、小儿疳积病、小儿严重发育不良、妇女子宫下垂、绝经、绝育、紫绀病、浮肿病、干瘦病……等等因饥饿和劳累引发的病患者，当在 3 亿 3000 万人次以上 [2]！

然而，对于这样一段痛史，迄今为止，就连起码的定性和断代分期都没有！历史已然尘封，瞩目者路断人稀！中华民族是一个几千年来有着极其强烈的历史传承意识的民族。以史为鉴，鉴往知来。过去的历史，正是现实与未来的参照和坐标。

让历史的真相大白于世，让历史的教训永誌人心，这是历史学家不泯的责任，这是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不二法门。

为此，我就自己的研究所得，昭明于世，就教方家。还历史以真相，为中国未来，提供借鉴的坐标和指向。鉴往知来，中国人才有可能找寻人类普世价值的光明前景！

本文限于篇幅，对人们已知者，简要串联成整体；重点在于厘清人所不及，然是为至要的大跃进～大饥荒事实、过程与阶段，旨在提供立足历史科学、放眼鉴往知来的历史清晰脉络。

回目录

一、大跃进～大饥荒：史学研究现状与建构

1、大跃进～大饥荒史学研究的贫乏

（1）历史科学与大跃进～大饥荒研究

历史学是以人类社会既往过程和由此将导致的动态趋势为客观研究对象的科学。而科学研究的前提，就是以概念化、程序化和公理化来建立自己的体系。

历史学以四个层面来构建其学科体系和研究领域：

考据学致力于历史真相的素材发掘，是为历史学学科基础之所在；

编年史和通史（含断代史）着眼于人类社会的既往过程，是为历史学学科主干脉络之所在；

专门史学着重于既往专门领域的过程踪迹及其未来的波动趋势，是为历史学学科枝干脉络之所在；

历史哲学则雄踞于人类独享的思辨精神宝座，理清人类社会踉跄而来的既往脉络，揭示人类社会面临选择的前行趋势，是为“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之真谛所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大跃进，及其导致数千万人死难的大饥荒，必将以其空前绝后的狂热荒诞和惨绝人寰，载入史册！

由于形格势禁，讳莫如深，时光流逝，人去物远，材料匮缺，又由于除极少数人外，研究者畏难而退，缺少定力，深入不够，致使该领域的研究，长期处于浮光掠影，或据经修史[1]，官史为凭；或想当然耳，以点概面[2]；或死钻“为当权者讳”的地方志，以讹传讹。

迄今为止，对于人类历史上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闹剧和大悲剧，对于二十世纪人类社会这样一场堪称之最的大闹剧和大悲剧，当事者风云流散，研究者不甚了了，后来者孤陋寡闻，历史的真相云谲雾诡！

对大跃进～大饥荒的历史研究，极少数史学家正致力于艰难困苦的历史资料收集整理，考据学刚刚起步，编年史和通史领域，仍为御用史学连篇假话所独占鳌头，历史哲学的理性阳光，尚且远离这片阴霾蔽掩的领地。

回目录

（2）大跃进～大饥荒学众家说

对于这一时期，我们可以接触到如下概念：

1.笼而统之的大跃进时期（1958 年～1961 年；大陆传统官史）；

2.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58 年～1961 年；大陆传统官史）；

3.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1958 年～1961 年；大陆传统官史）；

4.大跃进～艰难曲折的探索时期（1958 年～1962 年初；大陆新官史）；

5.大跃进～大饥荒时期（1958 年～1962 年；海外）；

6.大跃进～苦日子时期（1958 年～1963 年；当年民间说及中国大陆新史说）；

就连普通老百姓都明白，1957 年底开始的大跃进狂热躁动，和庐山会议后歇斯底里的“反右倾”、“更大跃进”运动，绝对不是同一性质的线性直进；至于“三年自然灾害”，更属欺人之谈：当年中国大陆所受灾害程度，绝对低于 1954～1955 年，实属正常年景；而那样一场史无前例的人祸，又岂是“艰难曲折的探索”，即可交代！

“苦日子”说，为当年流行在六亿多受害者之口、至今仍然为过来人所熟知的通论。

“大饥荒”之说，在海外流行已久；但在中国大陆，则是一个禁忌的词汇。

对于这段历史的断代划分，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以下这样几种观点：

1、一阶段论：

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1962 年初，七千人大会：“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2、二阶段论：

(1) 1958 年 1 月，成都会议～1959 年 7 月，庐山会议：大跃进时期；

(2) 1959 年 8 月，庐山会议～1962 年初，七千人大会：“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3、三阶段论：

(1) 1958 年 1 月，成都会议～1959 年 7 月，庐山会议：大跃进时期；

(2)1959 年 8 月，庐山会议～1961 年 1 月，中央工作会议："困难时期"；

(3)1961 年 1 月，中央工作会议～1962 年 1 月，七千人大会："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3、四阶段论：

(1)1957 年 10 月，八届三中全会～1959 年 7 月，庐山会议：大跃进时期；

(2)1959 年 8 月，庐山会议～1961 年 1 月，中央工作会议："困难时期"；

(3)1961 年 1 月，中央工作会议～1962 年 1 月，七千人大会："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4)1962 年 1 月，七千人大会～1962 年 8 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回目录

2、大跃进～大饥荒：史学研究的破题与建构

大跃进～大饥荒史学研究，必须把握两大要点，即：理清历史脉络；厘定灾难成因。

关于事件过程与断代划分，是构建立大跃进～大饥荒史学研究之前提。

科学的探索，必定以概念为规则、以公理为目标。历史学以历史阶段与时期的界定，为其建构和探究的起点、结构及内涵。

大跃进与大饥荒因果相承，厘定大跃进的断代，正是研究大饥荒的起点和前提。

对于大跃进～大饥荒的历史研究，作者提出破题性见解，以就教于方家。

概念定性：大跃进～大饥荒可分为两个时期；其时间应界定为 1957 年 10 月～1963 年秋收。

所谓"大跃进"，是指 1957 年 10 月～1958 年 11 月，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以"产品成倍增长，甚至十几倍、几十倍增长"[2]为手段，先以"超英赶美"、继之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全民运动；

所谓"大饥荒"，是指 1959 年 1 月～1963 年秋收，因粮食极度匮缺造成全民饥饿，和大规模爆发疾病与人口死亡的事件。

大跃进时期又可分 2 个阶段，大饥荒时期也可分 5 个阶段。

（一）大跃进断代分期：

(1)1957 年 10 月，八届三中全会～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大跃

进发动与初潮；

(2)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大跃进狂热高潮；

（二）大饥荒断代分期：

(1)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1959 年 7 月，庐山会议上阙；战略调整与饥荒初澜；

(2)1959 年 8 月，庐山会议下阙～1960 年 3 月，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前；“更大跃进”引爆大饥荒；

(3)1960 年 4 月，农村整风整社运动～1960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政策调整与大饥荒狂潮；

(4)1960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信》～1962 年 8 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前；“让步政策”与大饥荒次高峰；

(5)1962 年 8 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1963 年秋收；“反攻倒算”与饥荒抒解。

研究大跃进～大饥荒史要点有二：一是毛泽东“始作俑者”问题；二是粮食问题。

研究大跃进～大饥荒史，必须把握党国体制下，毛泽东以其操控党权的个人独裁，对于社会事变的绝对影响力。一党制国，党系国运；一人独裁，制党治国。是为大跃进～大饥荒成因之所在，也即极权社会“一言兴邦，一言灭邦”之所在。

拨开“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迷雾阴霾，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正是毛泽东的个人好恶和喜怒哀乐，导演了大跃进这场空前绝后的大闹剧，制造了大饥荒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悲剧！研究大跃进历史，史学家应该以此为高屋建瓴的着眼点。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不是历史决定论的必然宿命，而是毛泽东以个人意志强加于中国社会的历史悲剧，是毛泽东个性使然的狂热冲动，是“伟大领袖”个人好恶和性格造成的民族大灾难！

研究大跃进～大饥荒史，必须把握粮食问题是大跃进的目标与动力，更是大饥荒的核心与关键。

回目录

二、大跃进初潮与狂澜

大跃进时期，按断代史规则，可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1957 年 10 月，八届三中全会～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大跃进初潮；

第二阶段：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1958 年 11 月，郑州会议；大跃进狂热高潮。

下面，就这两个不同阶段作纲要叙述，以厘清其历史过程与脉络。

1、大跃进发动与初潮

（1）“始作俑者”吹响号角

时间：1957 年 10 月～1958 年 5 月。

标志性事件：1957 年 10 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以 1957 年 10 月为大跃进开端，就在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为）批判“反冒进”定下基调，并随即点燃了大跃进火种。

1957 年 9 月 20 日～10 月 9 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个人主观武断，一举推翻中共八大关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判断。从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论，成为毛用以对付党内外异己、确保其权力统治的锐利武器。

他再次骎骎然凌驾于八大确定的中央集体领导原则之上，大批 1956 年周恩来和陈云领导的中央“反冒进”：去年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他力主“多、快、好、省”，提出：“争取二十八年基本上达到苏联四十年的水平”的“促进”指标，强调“党委还是促进委员会，不是促退委员会”[2]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

话》。以此为随之而起的大跃进吹响了进军号。

根据八届三中全会批判“反冒进”精神，11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社论，肯定 1956 年是跃进，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社论第一次提出大跃进口号，从而大得毛泽东赞赏。他在给中央和各省、市、区党委负责人信中写道：“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而起。”“我要颁发博士学衔的话，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发明科学家。”

从此，大跃进成为毛泽东执着于相的兴奋点，也成为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

1957 年 11 月莫斯科之行，无疑是毛泽东心理冲动的巨大刺激：自建国以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在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粗鲁莽撞的机遇下，迅速膨胀为“超英赶美”压苏联，争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的心态。

10 月，苏联成功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引起世界巨大震动，也引发了毛泽东的感慨和雄心。

11 月 7 日，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做报告，总结苏联四十年来在钢、煤、电力和工业总产量的成就后，他宣布：15 年内，苏联将达到的水平：铁矿，2.5 亿到 3 亿吨，生铁 7500 万到 8500 万吨，钢 1 亿到 1.2 亿吨，煤 6.5 亿到 7.5 亿吨，石油 3.5 到 4 亿吨，煤气 2700 亿到 3200 亿立方米，电力 8000 亿到 9000 亿度，水泥 9000 万到 1.1 万吨，糖 900 万到 1000 万吨，毛织品 5.5 亿到 6.5 亿米，皮鞋 6 亿到 7 亿双……我们这里已经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建设的更高阶段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创造了一切物质前提和精神前提……我们有一切根据宣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

性格争胜好强的毛泽东，正从两大阵营、战争与和平、斯大林等问题上，向赫鲁晓夫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发起挑战。

（1958 年）1 月 18 日，在 64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他不甘人后地宣布：我国今年有 520 万吨钢，再过 5 年，可以有 1000 万吨钢；再过 5 年，可以有 2000 万到 2500 万吨钢；再过 5 年，可以有 3500 万到 4000 万吨钢……赫鲁晓夫告诉我们，15 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 15 年后我们可以超过英国。

在农家子弟毛泽东观念中，“超英”的工业化指标，被简单概括为一个概念：钢产量。

12 月 2 日，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公开提出：15 年后，争取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回到国内，毛泽东即以威怒相加于其他最高领导人为手段，加强推行高速发展经济的力度。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毛泽东大批反“冒进”，曾力主反“冒进”的周恩来和陈云等中央领导人被斥为“离右派只有五十米”的敌人境地。他气势摄人地借题发挥：“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

张奚若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5]毛泽东一股作气应承下来，并以此洋洋洒洒地大谈起他心中的宏图伟略：大跃进！

1958 年 3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成都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发威：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的个人意志，成为无人敢发异声的全党战略指导。会议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全国各地省、地、县、社，纷纷修改原定生产计划和指标，制订《跃进规划》，提出大跃进的高指标任务和目标。

以大跃进典型为例：1958 年 2 月，河南信阳地区开始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条》，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发动全面跃进，制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全面跃进规划三十条》，提出：1962 年，全区粮食总产 600 亿斤，争取 800 亿斤，亩产 4000 斤，两年内实现机械化；推广双熟或三熟制，培养亩产 5000 斤的丰产田 150 万亩，6000 斤的 200 万亩，7000 斤的 150 万亩，万斤以上 50 万亩；水利建设 1960 年达到一年不雨确保丰收。

大跃进不可逆转地狂风怒起。

回目录

（2）大跃进发端：“高产卫星”与冬修水利、积肥运动

大跃进最早从农村发端，启动标志，是颁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1957 年 10 月，中共公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继之而来的大跃进“以粮为纲”定下目标：在 12 年内粮食平均亩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 1955 年 150 斤增加到 400 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由 1955 年的 208 斤增加到 500 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由 400 斤增加到 800 斤。

为推进跨《纲要》，1957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号召全党：积极广泛地兴修农田水利，是扩大农业生产，防治旱涝灾害最有效的根本措施；多积肥多施肥，是保证增产的可靠办法。随即，一场以冬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农业大跃进，在全国农村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这场运动，从两个方面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和五亿多中国农民的命运：将专制体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诸农村；将共产体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诸农民。

毛泽东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 1957 年冬修水利高潮中，各地以省修建大型、地区修建中型、县社修建中小型水库和灌溉系统的布局，地无分山地、平原与水网地带，人无分男女、青壮与老幼，千军万马齐上阵，千渠万库齐动工。

各地普遍采用以社、队为单位，对男女青壮年劳动力实行军事化编制，实行"大兵团作战"，从而有效解决了对劳动力空前规模需求的难题，为农业大跃进，提供了数以亿计无偿使用的劳动力。

徐水是全国兴修水利的"红旗"。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在地图上作业，创造出平原修建"满天星"、"葡萄串"系列水库和干渠的一整套"先进经验"，并将农村劳动力编入军事化体制，形象化概括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从而得到毛泽东高度赞赏。而这些"满天星"、"葡萄串"系列水库和干渠，在随后雨季被毁于一旦。

"三化"以空前力度，以专制控制囊括每个农民。在冬修水利工程中，普遍发生对农民的"共产"剥夺，和惨无人道的暴力迫害。

县以下水利工程资金主要靠自筹，全国各县，无一例外地发动起"捐献"运动。

徐水提出"献现金、献债券、献金银、献粮油、献工具、献砖木、献炊具"的"七献"运动。对捐献不力者，即组织"辩论会"批斗暴打，发动社员互相检举揭发，抄家搜查。更为甚者，关进"劳改队"。1957 年冬修水利，徐水是全国的先进县，也是保定地区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在案典型。[7]

为筹措砖木，各地普遍实行撤房掀屋，挖坟起墓。

而积肥运动，也以"大兵团作战"形式组织起劳动力，开始长达半年左右的大浩劫。

当时农村大多为土墙茅顶。为放积肥"卫星"，各地普遍拆房掀屋，取茅挖土，以充肥料。北方拆炕掀灶，南方挖堂屋土，取烧土为肥。

奉贤县"三十万大军战江南"，县委强令农民日夜苦干，拆房子取砖，挖堂屋取土，禽畜棚舍挖地三尺，堆在一起"发酵"。全县大拆毁屋顶，取茅沤肥，割毁庄稼青苗，扔进江河湖荡，大放积肥"卫星"。

据统计，奉贤县在积肥运动中，拆毁民房 12000 多间，大办水利工程拆房取料 3188 间，人民公社化运动大搞"三化"，生活集体化后公共食堂缺柴火拆烧民房 2147 间，到灭虫运动拆烧民房、仓库 3168 间，大炼钢铁拆房 3600 多间。大跃进一年中，奉贤县共拆毁焚烧民房 25000 多间。[8]

1957 年冬～1958 年春的积肥和水利运动，使得中国农村发生了影响社会结构的翻天覆地大变化。

农村青壮年纳入"大兵团作战"，家庭开始出现松动；失去父母照料的婴幼儿、儿童和少年，以及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又失去儿女照料的老人，由此陷入绝地。

为此，一些地方开始建立起托儿所、幼儿园和养老院，随即普遍推广。水利工地普遍实行食堂制，成为后来“公共食堂”的前身。

继积肥和水利运动后，毛泽东又提出“深翻土地，增产粮食”。“深翻土地”运动在铺天盖地展开。毛泽东大力推荐的典型——河南长葛县委提出：“深翻六丈三，亩产一百万”，成为全国学习标本。[9]

中国农村，开始在三个方面开始发生根本性逆转：合作社的集体化生产，转向集体生产与集体生活一体化；此前生产资料高级社公有制，转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高级社公有制；此前一般初级社规模的集体化生产，转向以高级社乃至县级规模“大兵团作战”的集体生产与集体生活一体化。从而开人民公社之先河。

农业大国的中国社会，由此奠立了大跃进中举国一致的社会基础，及以专制强力维系大饥荒中民不致乱的超稳定社会结构。

回目录

2、大跃进狂澜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时间：1958 年 5 月～1958 年 11 月。

标志性事件：1958 年 3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

（1）粮食高指标与“卫星”狂潮

在毛泽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情绪推动下，中共中央确定了工农业生产高指标战略。

南宁会议后，“超英赶美”，成为大跃进目标。毛泽东以“纲举目张”的工作方法，将其概括为“一个钢铁，一个粮食”。大跃进中，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被否定，国家经济行为，被简单界定为钢铁和粮食两个高指标数字。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总路线”，提出实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争取在 15 年或者更短期内，在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争取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会议大批反“冒进”，指责对高指标和大跃进持怀疑的人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他们举的不是红旗是“白旗”，号召各地区、各部门要“拔白旗、插红旗”。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高指标、浮夸风急剧膨胀。

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建议的指标而言，工业方面普遍翻番，农业方面普遍提高 20～50%：钢产量由 1200 万吨，提高到 3000 万吨，粮食从 5000 亿斤提高到 7000 亿斤。

会议标志着中共中央正式以毛泽东大跃进战略为治国大政方略。大跃进势不可挡地迅速掀起狂潮。从中央到地方，高指标层层下压，浮夸风级级夸张。

所谓大跃进运动，就是要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

大跃进目的性指标，即“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粮食，一直是浮夸风的重点，也是高指标的起点和焦点。

1958 年 5 月以后，以夏粮收割为契机，农业首创竞放“高产卫星”狂潮。在这场“放卫星，争上游”大赛中，河南拔得“卫星”头筹。继而，经过中共中央文件指示和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等党报的大肆宣传，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竞相“你追我赶争上游”，贻笑大方的“放卫星”此起彼落，后患无穷的“浮夸风”泛滥成灾。

6 月 8 日，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卫星”，声称 5 亩小麦亩产 2105 斤；4 天后，该社又放出亩产 3530 斤的“卫星”；

7 月 31 日，《湖北日报》报道了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率先破万斤的消息，该社放出早稻亩产 10597 斤的“卫星”；

8 月 10 日，湖北孝感县创造早稻亩产 15361 斤的“高产纪录”；

8 月 13 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麻城县建国一社以缀禾并秧的办法，创下水稻平均亩产 36956.7 斤的“高产纪录”；这块高产田，被誉为“天下第一田”；

8 月 30 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应城县白湖乡长春社早稻亩产 44308 斤 13 两，刷新了建国一社的纪录；

8 月，《人民日报》消息：河北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小麦 12 万斤、亩产山药 120 万斤、亩产皮棉 5000 斤、一棵白菜 500 斤的“大卫星”；

9 月 1 日，《人民日报》与《湖北日报》再次宣布新的高产记录：湖北麻城县熊家沟乡建新六社、湖北谷城县黄畈乡农村一社，早稻平均亩产分别达到一个 52599 斤和 52658 斤；

9 月 18 日，《人民日报》宣布：广西环江县发射了水稻亩产 130434.14 斤的大卫星，从而创下人类历史上水稻亩产“最高纪录”；

11 月 25 日，《山西日报》报道：侯马市新绛县东方红人民公社，创造了全国红薯亩产新纪录。以社主任刘文生为主经营的一亩红薯试验田，共产 1139789 斤，超过湖南红专人民公社创造的红薯亩产 567570 斤全国纪录一倍还多。这是大跃进的粮食亩产最高的“大卫星”。

……

上有好者，下必行焉。毛泽东偏爱“大干快上”，各级干部即奉为圭符。所有这些“高产卫星”，都是在省、地、县各级层层加压下，基层干部欺上压下的产物。

7 月 17 日，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王任重代表省委作《在五年内建成社会主义新湖北》报告提出：“今年稻谷可能出现万斤，至少也有五千斤、八千斤的。要不，稻谷可成了低产了。晚稻肯定有万斤的，是不是可能有两万斤呢？也可能有。那么我国的稻谷单产就可能创造世界最高纪录。”

会后，黄冈地委书记姜一向省委表态：早稻定要过万斤，争取三五万。麻城县委书记吴德简向地委立下军令状，亲自落实了建国一社的“大卫星”。“天下第一田”的田头，树立着“王任重试验田”的大标牌。[11]

“以粮为纲”的高指标，带动了粮食“高产”的“卫星”狂潮。上上下下，粮食问题解决了的乐观主义一面倒。

7 月 23 日，农业部发布公报：当年夏粮空前丰收，总产量达到 1010 亿斤，比 1957 年增长 69%。9 月 30 日，新华社宣布：中国 1958 年粮食总产量将达到 7000 亿斤，皮棉总产量将达 700 亿斤，超过美国。

北戴河会议提出：粮食产量 1958 年要比 1957 年增产 80%，由 3900 亿斤达到 7000 亿斤左右，1959 年要比 1958 年增产 50％，由 7000 亿斤左右达到 10500 亿斤。

1958 年 11 月，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讨论当年粮食产量是多少，有的说有 9000 亿斤，有的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毛泽东说：“我不相信那个 9000 亿，搞到 7500 亿就不错了。”[12]于是，这个想当然的 7500 亿斤，就成为公布的 1958 年粮食产量。而据粮食部的核查，1958 年粮食实际产量，只有 3980 亿斤，两者相差 3520 亿斤。

大跃进“始作俑者”的毛泽东，为形势鼓舞，日渐处于极度亢奋之中。他开始为“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而发愁，并（于）8 月初与赫鲁晓夫会谈时询问，苏联是怎样解决粮食吃不完问题的？

“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解决”了农业问题，“钢铁元帅”上马了。

回目录

（2）“以钢为纲”与“大炼钢铁”

1957 年 11 月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将“超英”的指标，简单概括为一个“钢”

字。这成为大跃进步步拔高的指导思想。

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提出：5 年内钢产量由 520 万吨钢，增长为 1000 万吨。

3 月成都会议提出，1958 年钢产量，由 624.8 万吨，提高到 700 万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将 5 年内钢产量提高到 3000 万吨；5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将 1958 年钢产量，定为 800～850 万吨；会后各大协作区的上报数字，1959 年钢产量可达 3000 万吨，预计 1962 年，钢产量可达 8000～90000 万吨以上。

6 月 19 日，毛泽东约见冶金部长谈话，提出 1958 年钢产量，要在去年 535 万吨的基层上翻一番，达到 1070 万吨。北戴河会议正式确认钢铁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要为 1070 万吨钢铁而奋斗，提出 1959 年钢产量为 2700～3000 万吨。[13]

8 月 16 日，毛泽东提出：全党全民抓钢铁工作。8 月 21 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讲话中竟然骇人听闻地提出：要大收废钢废铁，暂时没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撤掉。

全国各地的砸锅炼铁运动掀起高潮。

随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认：农产品产量将“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要求各省、自治区党委把注意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来。

北戴河会议后，全国掀起了以全民“大办钢铁”为中心的狂潮。

7 月底，全国投入“钢铁战线”的劳动力为几十万人；10 月，猛增为 6000 万人；年底高达 9000 万人。

“全民大炼钢铁”，大搞“遍地开花”，“土法上马”的“小高炉”，　普遍采取极为野蛮愚昧的手段。为了建造土炉，各地拆屋取砖；原料不足，抄家搜查，各家各户，锅、铲、刀、斧，锄、镰、耙，所有铁器，搜刮一空，投入高炉。为解决燃料问题，全国各地数千万人上山大规模砍伐森林树木烧碳。

广西“大炼钢铁”，700 万大军上战场。到 10 月，柳州地区“钢铁卫星”在广西夺冠。10 月 15 日，环江县发射“全国第一的大卫星”：日产生铁 63321.5 吨，另有烧结铁 51808.5 吨；18 日，鹿寨县放出全国最大的“生铁卫星”，日产生铁 207243 吨，另产烧结铁 288139 吨。《人民日报》报道：鹿寨将几十座山头的树木与“矿石”埋进十几里的山沟，创造出“大炼钢铁先进经验”！21 日，环江又放出日产钢 13416 吨的全国最高纪录“大卫星”。地委提出：“粮食万斤亩，钢铁超英国！”

石龙县（原武宣）地处亚热带，原始森林古木荫天。1957 年初，全县有林面积达 69.42 万亩，其中山林 57 万亩。在“大炼钢铁的人民战争”中，柳州地区规定：武宣县要建 3010 个炼钢铁的小土炉，炼钢 2 万吨，炼铁 9 万吨，采矿 50 万吨，烧木炭 100 万吨。

1958 年武宣 16 万人口，农民劳力 7 万人。查阅当年资料表明，石龙县当年在大炼钢铁的“人民战争”中，共投入劳动力 11 万多人。79％的干部职工，50％的农民和 97％的学校师生，被送上“炼铁战场”， 拆房、砍树、烧炭、炼钢铁，日夜苦战几个月。

据后来“三反”运动估算，“大炼钢铁”， 石龙县大约拆毁民房 8000 多间，建成三大“钢铁基地”：东乡的王道、金岗，三里乡的白河、灵湖，桐岭乡的盘龙。仅盘龙的盘古村就拆了 700 多间，按当年比价损失 14 万多元。民众居无住所，流离失所，妻离子散，情况达到极严重地步。

10 月，石龙县放出日产钢铁 20 万吨的大“卫星”。

为此，武宣伐掉森林几十万亩，86％的山林遭受毁灭性破坏。加上吃食堂烧毁的木材，近百万立方米林木化为灰烬，全县民众的生活铁器化为“矿石”进炼炉。炼出的“钢铁”，不过是搬不走、砸不烂、百无一用、渣石相融的烧结铁！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志•大事记》载：仅大明山林区就有（有）案可查的 10 万人驻扎在山上砍树，共砍伐森林面积 31 万亩。大瑶山林区八个县，在一天之内就砍伐树木 10 万立方米。据林业厅 1958 年 2 月报告，据估算，当年全自治区共砍伐各种木材折合森林蓄积量为 3700 万立方米。按市场时价，价值超过 750 亿元人民币。

12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布消息：12 月 19 日，全国已生产钢铁 1073 万吨，提前完成钢产量翻一番任务，胜利实现党的伟大号召。年底，宣布钢产量为 1170 万吨，铁产量 1369 万吨。

“大炼钢铁”，祸国殃民，更造成中国大陆最为严重的生态破坏：83.5%的森林被毁灭怠尽，此后水土流失经年加剧，山河破碎，民不聊生！

回目录

（3）“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与人民公社化

1958 年 5 月后，中共完全遵从于毛泽东的心情与乌托邦理想，加速进行所谓“所有制革命”，企以所有制抢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弥补生产力落后处境，实现争夺国际共运领袖地位目的。8 月，北戴河会议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将这场大闹剧演绎至荒谬绝伦的绝地。

研究大跃进起源、目的与晚年毛泽东乌托邦激情，人们不得不注意这段材料的指向性蕴含：在当时风靡全国的新文化运动中，青年毛泽东综合其接受的各种从中国古典大同思想、“均贫富、等贵贱”农业社会主义、时下流行的无政府主

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会（产）主义思潮等元素，曾向世人宣布了他心中的理想新世界："新社会之各种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场、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1919 年 12 月 1 日）

毛泽东老年心理，很大程度上是现实环境的青年心理折射。（余习广《文化与心理：毛泽东早期思想研究》，《青年理论家文稿》第二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年 5 月第 1 版）同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竞赛"，是现实的刺激点。莫斯科会议，赫鲁晓夫宣布：要在 15 年内把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不甘人后的毛泽东，早在 1957 年 10 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以钢铁为指标，快速赶上苏联的想法。他在总结中提出自己的设想："是不是可以将苏联的弯路撇开，比苏联搞得更快一点，质量更好一点"。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时，意气风发地揭橥其大跃进心理底蕴："中国应当成为世界第一个大国"，并特别向与会者强调："要赶上苏联"！（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 年 5 月 8 日）

毛泽东明白，虽说"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但要赶上和超过具有强大工业基础的苏联，谈何容易。而更容易推进的"所有制革命"竞赛，就提上议事日程。他决心先声夺人。

1958 年，毛泽东在一次同刘少奇的谈话中，重复了他从青年到晚年矢志不渝追求的梦境：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

1958 年春，毛泽东在同陈伯达谈话中说，乡村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据此，7 月 1 日，陈伯达公开宣布："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人们以及可以看得见我国将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为期不远的前景"。（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庆祝中共成立 37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红旗》杂志，1958 年第 4 期）

1958 年 7 月 31 日～8 月 1 日，赫鲁晓夫访华。因苏方提出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对敌的"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毛泽东感觉民族主义和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而大发雷霆。5 日，感觉深受刺激的毛泽东，开始古代帝王式南巡。他要掀起一场旨在所有制革命的大跃进，彻底改变中国社会面貌，把那个令人难以忍受的赫鲁晓夫和苏联，远远抛在身后！

毛泽东南巡第一站，选择了徐水。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物。1956 年后，他一直非常注重研究毛泽东的建设思路，创造性地发明了“军事化、战斗化、集体化”的军事化组织，社社大办“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托儿所、幸福院、缝纫社、社办工厂、红专学校等“具有共产主义萌芽”、 给以毛泽东“共产主义社会新蓝图”启迪的社会结构。因而得到毛泽东的长期关注，指令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陈正人长期蹲点。

在徐水，毛泽东视察了上述“共产主义萌芽”，考察了徐水的“卫星”田。

随后，他下令刘少奇挂帅、陈正人负责，开始进行“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为全面实行共产主义开辟道路（ ）。

共产主义社会的组织形式得到毛泽东首肯，其名称也在这次南巡中得以确认。

1958 年 4 月，信阳嵖岈山人民公社最早问世。随即，河南许多地方开始仿效。在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毛泽东发话称：“人民公社好”。次日见报。各地开始跟风。

1958 年 8 月 17 日～8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召开。会上，毛泽东全面阐述了他对大跃进和加快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纲领性思想。

他提出：现在不搞人民公社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许多社合为一个大公社……1955 年我就提倡办大社。全国一万五到两万五千个社，每个社五千户到六千户。两三万人一个社，相当大了。这样，便于搞工、农、商、学、兵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养猪都归公，自留地暂时还留一点），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

要考虑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

毛泽东激情难抑，狂热地向与会政治局委员、列席会议的部长和省委书记们描绘起天方夜谭般的共产主义：

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用军事组织——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那时道德水平大为进步，劳动不要监督，要他休息不休息。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萌芽，是对资产阶级法权制度的破坏。

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共产主义精神，一有命令，每个人都自觉地去工作。

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大变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

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将来一律叫公社。

全国是一个大公社。

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 年 8 月 19 日、21 日）

毛泽东极度狂燥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心态，成为中共中央战略指导。

1958 年 8 月 29 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化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发展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空前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创造了可以基本上免除水旱灾害、使农业生产比较稳定发展的新的基础；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更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农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愈来愈迫切；农田基本建设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进一步提高了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公共食堂、幼儿园、红专学校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生活锻炼和培养了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因此，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的基本方针。

《决议》在规定一系列具体措施后，将豪言高调留诸后世贻笑大方：“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p446～450）

从此，“三年建成共产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了毛泽东心中最富特色的口号。北戴河会议，正式吹响了人民公社化和“全民大炼钢铁”的进军号。什么大不列颠、美利坚，统统不在话下！毛泽东的激情好象一把火，燃烧着整个神州。中国大陆陷入一场全民狂热的激情冲动之中！

北戴河会议后，以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从狂热走向癫狂。

全国农村一哄而起，人民公社化运动掀起狂潮。到 10 月底，全国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原有 74 万多农业社，改组为 26000 多个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占总农户 99%。平均 28.5 个农业社并成一个公社，3 个多乡为一个公社。固始县七一人民公社，46161 户，201075 人，为河南省公社之最。

更有一县一社者。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开始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大竞赛。

徐水全县合并，成立徐水人民公社，号称实现了全县全民所有制，提出“苦战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成为全国样板。

山东范县更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

人民公社在所有制上，实行彻底共产。农民原有的生产资料，如土地、牲畜、工具等，高级社时以名义上的折价入集体，此时无偿归公；生活资料和家庭副业，如房屋、家俱、炊具、粮食、生猪、家禽等一律共产归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劳动力无偿平调使用。在后来整风运动中称“一平二调共产风”。

在组织形式上，实行“三化”。大部分地区拆散家庭，男女劳动力编入军事化组织，老人入“幸福院”，小孩进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吃饭上公共食堂，严禁私自开伙。在后来整风运动中社员反映：食堂成为各级干部掐死社员脖子、实行管卡压的“鬼门关”，干部吃香喝辣、贪污腐化的“享乐园”。

在生产方式上，实行自上而下的计划指导，和以公社、甚至县为单位的、农村劳动力奉命而行的“大兵团作战”。 各级干部普遍以各种暴力作为推动生产和大跃进的方式，社员毫无人身自由和权力，成为失去自由的公社农奴。在后来整风运动中称为干部“瞎指挥会”和“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风”。

毛泽东式乌托邦的人民公社化实践，把东方专制主义推向极致。

在毛泽东式乌托邦思想来源的先贤那里，从东方孔夫子到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从西方托马斯•莫尔《乌托邦》、罗伯特•欧文“纽哈蒙尼”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无一例外地声称其目的是造就幸福。而在毛泽东的经典词汇中，最有名的当属“苦战三年，改变面貌”。 苦战，成为毛泽东时代最强音，也必然成为苦难的代名词。

人民公社的“三化”统治，结构上将全民编入军事化体制，目标上是为了达到大跃进的高指标数字，手段上以干部实施高压和暴力来推动生产、管理生活。人民公社，把东方专制推向了对“全民专政”的境地。

以县为单位，全国各地无一例外地建起大跃进专用“劳改队”，一些地方公社和大队也成立“劳改队”、“集训班”，用以“改造”地富反坏右”和“破坏、消极怠工、懒汉、流窜犯、心怀不满、讲怪话”者之类。全国掀起“专政大跃进”。

1958 年 11 月 16 日，公安部长徐子荣在华东政法片会议的总结发言，就将这种“无产阶级全面专政”，作为“公安战线大跃进的伟大成果”。他在总结发言中说，据统计，“五省一市（福建、安徽、江苏、江西、浙江、上海）在 10 个月中共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破坏分子 804230 名，计：捕了 237616 名，杀 1301 名，管制 131380 名，劳改 83131 名，戴回帽子 115738 名，批判斗争 205064 名。安徽一省就捉了 118000 多，江苏也捉了五万多。”

据中共上海市委工作组的复查材料，当年奉贤因干部严重违法乱纪，强迫命令，直接造成死亡的共 102 人，其中死于“劳改”、“集训”的 23 人（打死 7 人，自杀 16 人）；全县被送入“劳改队”进行强迫劳动改造的共有 5700 多人。无辜被撤职、停职的干部有 660 余人。

据奉城公社调查，在死难者中，贫农占 50.8%，中农占 41.5%，地、富占 7.7%。

据对泰日公社两个“劳改队”106 人的调查，属完不成高额任务而扣上“生产不积极”罪名，因饥饿难耐偷了庄稼吃而扣上“手脚不干净”，“思想作风不好”，甚至“吃饭抢先”也被治罪送劳改的即占 74.5%。

更有甚者，因实行“三化”，废除家庭，共产共居，孩子送“幼儿园”和“托儿所”，中小学生在校吃饭。而后来“幼儿园”和“托儿所”食堂很快缺粮断炊，孩子们流离失所，衣食无着，而跑到地里偷吃庄稼，到食堂偷吃的。公安干警无法无天，刑讯逼供，违法乱纪行为极普遍。在 2 月和 8 月的大抓“儿童犯”战役中，先后有三千多名“儿童犯”“落入法网”。

县公安局于三月和八、九月间，先后两次在南桥镇举办“儿童集训班”。共集训儿童 270 多人，其中大多数是 10---13 岁的儿童，最小的年仅 6 岁。

“儿童集训班”种种体罚、虐待成了家常便饭。据当时对被集训过的 88 名儿童调查了解，受过捆绑、吊打、扯耳朵、抽皮带、煽耳光、晒毒太阳、罚跪和性虐待等刑罚的就有 85 人。（余习广、孙强：《奉贤大劫难》）

在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试验田”，徐水县刮起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共产风”：土地、林木、房屋、牲口、农具、各种机具、家俱、劳力，甚至小到社员家中的锅碗瓢盆，统统共产。绝大多数情况下，社员只允许随身携带换洗衣物，便被扫地出门。有关资料显示，徐水县 1958 年建立人民公社以后，全县共平调集体和个人财产总值 1246 万元。其中：平调土地 40487 亩，大车 906 辆，各种机器 283 台，农机具 42726 件，家俱 38748 件，砖瓦 80000 块，房屋 22347 间，平调劳动力 1105629 个。平调粮食 118580 斤，大牲畜 257 头，猪 3391 口，羊 980 只，树木 41 万株。而上述统计，仅为被低价估认的“一平二调”财物，不含公社化时宣布“共产”归社的上述财物价目。

农民是“天生的小私有者”和对他人财富的“共产”热心人。但面对自己财物被“共产”，无人甘心。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的口号是：“一律专政”“全民专政”。“破坏、消极怠工、懒汉、流窜犯、心怀不满、讲怪话”

1958 年 6 月、8 月和 10 月间，他搞了三次捕人高潮，并指示县、公社、村三级都成立了劳改队，捕人指标由张国忠拟定下达，并限期完成。

同年 10 月，安新、容城合并入徐水县。张国忠和刘裕、汪青山商量，为统一“捕人标准”，徐水搞起了第二次捕人高潮。并提出在安新、容城捕两千人的任务，并由刘裕在电话会议上宣布，被捕对象是：地、富、反、坏、右、小偷小摸、私贩运托一律扫光。会后，仅安州公社一夜就捕了三百多人，原安新五个公社共捕了 990 名。

此后，张国忠给另一名县委成员打电话谈感想：“捕人真起作用啊，能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大跃进，就要的铁的纪律和手段！”

农村工作部长王庚臣带领工作组一次就捕了二百多人。一次，他在南犁乡召

开的万人大会上，用“点名检举”的办法，捕了 51 人，当场打成残废的有偿（三？）人。经他手前后逮捕的就有 820 人之多！在大炼钢铁运动中，他告诉工地指挥部的负责人：“看着不精神的该逮就逮起来，要不出不了铁。”

据县委对 12 个公社的统计，公社化后，全县劳改集训达 7295 人，其中基本群众 4715 人（内有党员、团员、干部 452 人），地富子弟和一般顽（汪）伪人员 496 人，五类分子 2384 人。因劳改致疾而死 124 人，残 24 人。商庄公社建立 18 个劳改点，对“劳动不积极”、“说话生硬”、“走路慢”、“干活慢”的人集中劳改。大批讨米要饭的饥民、孤儿也被送去劳改。

而据河北省委工作组统计，仅徐水县被非法逮捕劳改的就有 7295 人(其中党、团员、干部 452 人)，劳改致死 124 人；被捆绑吊打的基层干部和群众 6223 人，致死 239 人，致残 146 人。而被批斗者无法进行统计。据西留营、南张丰、八一农场三个劳改队统计，有 30 人捕后死在劳改队，其中包括两名党支部书记。（ ）

在人类历史上，源于毛泽东式乌托邦社会实践的人民公社，第一次将专制主义进行到空前绝后、惨无人道的境地，也为我们留下了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回目录

三、战略调整与大饥荒初澜

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1959 年 7 月，庐山会议上阙；大跃进战略调整与大饥荒初澜时期；

这一时期表现为两大特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狂热，从降温转为全面调整战略决策；与此同时，1958 年冬季开始，大饥荒在农村全面爆发，1959 年春荒席卷全国。随着调整力度加强，农村逐渐恢复生机，至夏收后，粮食形势稍有好转。

大跃进是大饥荒的历史前提，大饥荒是大跃进的逻辑归宿，而将二者以必然性连成一体者，则在于社会系统和政治体制的权力结构。党国体制和霸踞其上的毛泽东个人胸臆，仍然是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解析关键。

1、毛泽东：狂热降温与战略调整

时间：1958 年 11 月～1959 年 2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

事件：1958 年 11 月，郑州会议～1959 年 2 月，第二次郑州会议；

迄今为止，为官方和御用史家津津乐道的是，是毛泽东最先提出了对大跃进的纠左和调整。他们刻意忽略的一个事实是：稍有理智的人，都会看清“三面红旗”和当时极度狂热的危害；体制决定了党内噤声，鉴于毛泽东的性格，党内高层无人敢直言，否则必然是庐山会议彭德怀的下场；而冒险发声的社会良知，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和改变。

从大炼钢铁和公社化高潮以来，有案可查的不同声音，党内有邓子恢对“放卫星”和“浮夸风”的批评，社会上有持续不断的上书反映。（ ）

毛泽东是性情中人，而党国体制又赋予他自称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率意而为的绝对权力。“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他狂热激情的产物，也因其兴之所为而转折。

精神病理学认为：亢奋状态难于持久，具有间歇期特点。一般而言，亢奋期

过后，常人会回复自我调整。而适度刺激，会加强这种转变。

对于其刻意追求的社会巨变，毛泽东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他心里也没有底。

1958 年 10 月，毛泽东先后找河北省委、天津市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和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县委负责人，了解"共产主义试验田"情况。

1958 年 10 月 18 日，因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赴徐水 18 人下乡队（含舞伴"朋友"）写给他的《关于徐水县公社化情况的报告》，反映徐水县"一平二调共产风"，弄虚作假"浮夸风"，这立即激起其愤怒。在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奉命而行的汇报后，他愤怒地下令停止了"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并（在）接到大量反映干部问题的上书，随即指示有关人员开展调查后，毛泽东逐渐改变态度。（ ）

1958 年 11 月 2 日～10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成为"第一次郑州会议"。

会议期间，毛泽东对立即取消商品和货币问题、高指标和一哄而上急于过渡问题，做出否定。他提出："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现在有一种倾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对干部问题，他说："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论人，罚苦工，动不动就'辩你一家伙'。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并强调："现在不是消灭家庭，二（不）是废除家长制"。（毛泽东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纪录，1958 年 11 月 9 日）

毛泽东以饰过心理，把问题的责任下推。在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关于读书的建议》信中，他推荐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并象教训孩子般地说："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遇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6 月版，p432 ）

会议通过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明确指出：现阶段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第一次郑州会议，标志着在战略思想上，正式开始了对狂热降温的第一步。但毛泽东仍强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11 月 21 日～27 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举行，又称武昌会议。毛泽东着重于共产主义过渡、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

会上，毛泽东以风趣横生而中肯忧虑的语调说道：我们乡以上的干部，没有一百万，也有几十万，就是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五亿多农民人均收入不到八十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一九三八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十二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慎。我们有说两年的，也有说四年的，也有说五年的，就要进入了，哪有那个事呀？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了几个同志去看了看，他们说“难于进”。

在谈到 1959 年生产计划时，毛泽东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的太重。要压缩空气。对钢产量，他提出，恐怕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难于办到。经同与会的相关负责人探讨，他提出搞两本帐，第一本帐是一千七百万吨，第二本帐是翻一番，两千二百万吨。各部门的指标也都要相应地降下来。

针对全国各地干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绪，和干部强迫群众高强度劳动等问题，毛泽东提出：共产主义还是要趁穷过渡有优越，但不要向苏联抢先，工业基础还不够，何必急急忙忙自封圣人。徐水发一元钱的共产主义不得人心。要让人家吃饱饭，睡好觉。公共食堂就是吃穷饭。苏联有 5500 万吨钢，一亿吨以上的石油，科技人员成百万，全国人民中学程度，搞了 41 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现在上破落户，一穷二白，一穷二弱，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们十年是四亿吨钢，二十五亿吨煤，三亿吨石油，我们有天下第一田。到那时候，地球上是天下第一国，搞不搞得到是另外一个问题。毛泽东一支香烟接一支，吞云吐雾，对高强度劳动不满：钢铁、煤炭、运输、化工，这么搞起来，中国非累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撤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了问题。人民公社要整顿四个月，要搞万人调查团，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 8 小时。

他专门讲了“作假问题”。他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纪录）》，1958 年 11 月 23 日）

会议前后，毛泽东对反映河北邯郸地区领导干部只注重生产，忽视群众生活，社员劳累过度，抵抗力下降，致使伤寒病流行；和春夏之际云南发生缺粮，浮肿病引发严重死亡的材料上批示，承认“我们对于人民群众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的太重，密切有关”。“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毛泽东：《一个教训》，1958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文集》第 7 卷，p452；毛泽东对新华社《内部参考》第 2630 期电讯稿《邯郸专区伤寒

疾病普遍流行》的批语，1958 年 11 月 14 日）

武昌会议后，全党正式开始了对大跃进战略及其指标、速度和措施的调整工作。

会议讨论、修改和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针对当时突出问题，两个文件重点在于解决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以及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及放宽公社对于农民的过度控制。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规定："社员可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P63，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第一版）

八届六中全会，标志着中共中央正式接受了毛泽东关于对大跃进实行战略调整的思想。

然而，长达一年之久、一浪高过一浪的大跃进狂潮，已经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就在中共中央实行战略调整的同时，大灾难已势不可挡！

回目录

2、1959："苦日子来了！"

时间：1958 年 11 月～1959 年 8 月；

事件：1958 年 11 月，粮食征购后引发粮食危机，公共食堂缺粮～1959 年 8 月，庐山会议前；

1958 年秋粮超额征购和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很快引发了全国农村粮食危机，至冬季发生公共食堂普遍缺粮断炊；中央指示下，全国农村开展"反瞒产"运动，进一步加剧危机，造成大饥荒空前大爆发，并随之蔓延，城市粮食供应和储备短缺；农村发生大规模逃荒、疾病、死亡；随着政策调整力度加强，农民逐渐获得极少的自留地等生产资料自主权，夏收后，粮食紧张局面稍有改善。

粮食短缺是从 1958 年 11 月秋粮征购后开始的，是年冬荒，急剧演变成为全局性危机；至 1959 年 4 月，大饥荒空前大爆发。1959 年春，全国农村流行一句话："苦日子来了！"

中央对 1958 年粮食总产量估产为 8500 亿斤，公布数 7000 亿斤。据后来在"双整"运动后粮食部的数字，当年实际产量只有 3980 亿斤。

据我对大跃进•苦日子典型百县调查、采访和查阅有关志书记载，1958 年是

为好年景，个别地区的灾害程度，也属于常规态。然而，1958 年，为农业减产年。

据我的调查采访和查阅有关文件、档案，1958 年大跃进，因盲目推行双季稻、三季稻、高度密植、深翻土地等所谓"技术革命"的瞎指挥；以及土地共产，"大战、苦战"持续不断，劳动力普遍过度劳累不得恢复；又因 9000 万人上阵"大炼钢铁"到年底，秋收时农村劳动力奇缺，各地普遍实行粗收大放，粮食未能精收细打，颗粒归仓，许多烂在地里；更重要的是，被剥夺而被役使的广大农民，与他们的劳动生产结果脱离关系，生产积极性大为降低，一旦脱离干部视线，磨洋工和消极怠工成为普遍现象。诸多因素共同造成粮食比 1957 年减产[32]。

因此，1957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3900 亿斤，1958 年粮食总产量，应该低于 3900 亿斤，更低于粮食部 3980 亿斤的数字。

与此同时，粮食挥霍浪费极为严重。作为"共产主义因素"的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从 8 月公社成立到 11 月秋收发生粮荒，一直实行"敞开肚皮吃饭"。集体仓库粮食很快见底。

粮食估产高度"浮夸风"，而当年粮食征购完全按照估产的 8500 亿斤计划。1958 年度（1958 年 7 月 1 日～1959 年 6 月 30 日），全国实际征购粮食 1113.5 亿斤，比 1957 年多征 195.14 亿斤，增长幅度为 21.25%。

减产、多征、浪费、多吃，诸多因素会聚，大饥荒势不可免。

12 月 13 日，周恩来开完武昌会议，率领陈毅副总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及一大群部长，在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的陪同下，视察麻城。参观完"天下第一田"，来到公共食堂大门口，看到了那幅毛泽东赞不绝口的对联："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他掏出纸笔记录下来，还对陪同的张平化说："同志们都应该把这付对联记下来，这幅对联是很有意义的。"[33]

而早在 11 月下旬，麻城和湖北大多数农村一样，已经开始发生粮荒。

1958 年，湖北粮食产量为 190 亿斤（仍有水分），而湖北省委上报为 450 亿斤，当年征购任务和外调任务急剧增加，全省外调增加 6 亿斤。年底，恩施、黄冈、宜昌、荆州、襄樊等地粮食告急，食堂停伙，饥民逃荒，浮肿蔓延，死人发生。1959 年 1 月，武汉市只剩 1 天存粮。为了救急，武汉市委将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扣下。中央办公厅为此大发雷霆，要处理武汉市委负责人，王任重出面承担责任，此事才作罢。

到 1959 年 7 月，湖北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近百万人患病。以致于 7 月上庐山开会前，毛泽东视察湖北时，湖北省委竟然挖遍库存也难以准备出毛泽东喜欢的腊肉，随行人员私下埋怨伙食差[34]。

据不完全统计：1959 年 1 月至 5 月，全省病饿致死的农民高达十多万人，浮肿病人大量出现（7 月 4 日，庐山会议神仙会阶段，王任重检讨说：湖北饿死

1500 人，15 万人浮肿）。一时间荆楚大地饥民遍野，逃荒、要饭的“盲流”滚滚……而各地民兵，公安奉命设卡堵截，大抓破坏社会主义形象的盲流，送劳改，罚苦力。

黄冈是湖北大跃进先进。地委原报 1958 年粮食总产 50 亿斤。后在“纠风整社”时，调整为 33 亿 9908 万斤（实际不到 30 亿斤），比 1957 年减产 4.5%。而征购任务，由上年 6 亿 2907 万斤，增加到 7 亿 1065 万斤，多征 8158 万斤。

1959 年春荒，湖北最严重的是黄冈，黄冈最严重的是麻城、应城、蕲春这些高产“卫星”县。

“天下第一田”的麻城县牛皮吹得大，征购自然更高。县委宣布：1958 年，麻城粮食总产量超过 10 亿斤。因此，下达的征购任务为 1.2 亿斤，后调整为 9294 万斤。比上年多 1169 万斤，全县人均多征 17 斤。而 1958 年粮食产量，实际不到 4 亿斤，县委后来“落实”为 4 亿 2725 万斤，比上年减产 5709 斤。

“天下第一田”的河北垸，1958 年放大“卫星”，结果高产、高征购。征购后，全社留下的粮食不够吃两个月。12 月开始，社员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二两米！食堂一天开两餐，有时开一餐，吃的掺菜稀饭。青菜吃完了，社、队（员）发动社员去采野菜、草根、树皮掺在稀饭里。县委还一个劲发动干部搞“瞒产粮”，要完成征购粮任务。到了春节，家家户户哭声连天，男女老少饿得肚皮贴着脊梁骨。

大年三十晚上，河北垸一些农民把填枕头的谷壳倒出来，磨成糠煮一餐“团年饭”！大年初一，干部只好把喂猪的粗糠，分给社员磨了吃。正月十五那一天，小队又把喂牲口和积肥的菜枯、麻枯饼，分给社员当粮。

到了 3 月，公共食堂断炊了。“天下第一田”如今却连吃糠、吃野菜都难了。社员靠野菜、野草救命，甚至挖“观音土”当粮吃。还有社员跑到 20 多里路外的大坳水库，到山里挖葛根、蕨根、麻根，拿回家当粮吃。近处挖完了，又跑到 60 多里外的野马岗挖野菜。

1959 年春荒，麻城吃野菜毒死 83 人，中毒 2758 人。

1960 年 8 月整风运动中，县委在一份检讨材料中说死人 1370 人。1961 年“五反”运动，省、地工作队有一份材料：1959 年春荒至夏收，麻城县因食堂断粮饿死、病死 4500 多人，病倒 37380 人。实际情况应该远比这严重[35]。

粮食征购困难，以及不断的群众上书，反映饥荒私（死）人问题，引发了从地方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于粮食紧张和的关注。但是，根据前期“经验”，从省、市、县委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致认为：1958 年粮食大丰收，农村缺粮，是因为农民和一些基层干部出于“多吃粮、自私自利、富农思想作怪”，对粮食“瞒产私分”。

1959 年 2 月，王任重在整党中谈到缺粮问题的讲话具有典型性：“今年闹粮

食问题是思想作怪，不是真的没有粮食。经济作物地区、受灾地区真缺粮的是少数，这些地方多数没有闹粮食，闹得多数是产粮区，有余粮，而且余粮很多，统购统销没有完成的地区。是那样的公社、那样的生产队在闹，他们以攻为守，吵粮食是为了少卖余粮，为了瞒产私分，不是真的缺粮。他们为了抵抗统购，硬说把食堂停伙、吃菜。”“至于瞒产的花样，真是多得很，就像我们过去对付日本人一样坚壁清野的办法，放到山洞里，埋到地下，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瞒产藏粮，生产队的干部对付大队干部，大队干部对付公社干部，公社干部对县委，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不讲实话。”因此，“必须有决心和信心以粮食问题为中心反对瞒产私分，反对贪污多占，打好整党整社这一仗。”[36]

3 月 11 日，湖北省整社纠风六级干部大会。一提到完不成中央粮食征调，各地上报粮荒问题，王任重不由得火冒三丈：“全省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是大跃进、大丰收。在大丰收的情况下，出现了怪事情：粮食、棉花、油料的统购任务完不成！”

他声色俱历地嚷起来：“全省粮食产量 1958 年比 1957 年增加了 200 亿斤，中央要我们多调出多少斤粮食呢？比一九五七年只多调六亿斤。可是到现在完成得很差。这一点，我们湖北省是很不光彩的！”“更怪的事情是，不仅仅没有完成收购任务，有一部分地区还大闹粮食风潮，什么食堂停伙，没有粮食吃了，一天十二两米（十六两一斤老秤一引者注）、八两米、四两米、挖藕、吃菜、往城里跑。有的地方闹得乌烟瘴气，就象一九五四年大灾荒后的样子，简直惶惶不可终日。”

而灾荒危如刀兵水火！就在他说话同时，全省有 800 万人一天只能吃到三、四两米（老秤），更有 1300 多个食堂断炊[37]！

问题发生就要解决。为此，湖北全面部署“反瞒产”运动。好在紧跟毛泽东的的王任重，后来在调整中下令结束。

广东是大跃进的先进，粮食征购困难，首先引起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警觉。在他指示下，广东开展起“反瞒产”运动。

1959 年 2 月 27 日，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上报《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称：雷南县晚稻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一系列干部会议，交待两项政策，即：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加）以处分，甚至法办。结果查出隐瞒私分的粮食 7000 万斤。雷南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雷南县召开以县为单位的生产队长和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交待政策，是解决粮食问题的最主要、最好的形式。

而据我对该县调查，是年春荒，饥荒严重。反“瞒产私分”造成了随后公共食堂大规模缺粮断炊，因饥荒造成严重疾病和人口死亡。

毛泽东接到报告，欣喜慰然，自以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是所有者（？）和“共产风”，造成了农民“瞒产”。他对此做出批示：“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成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像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38]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农村大规模开展起以“反瞒产”为目标、结合调整人民公社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地方冠名为“整风整社”运动。“交待政策”、“坦白交待”、“处分法办”成为运动主要手段，一场“反瞒产”、“算账交粮”运动，对大饥荒造成雪上加霜的严重后果。

据薄一波回忆：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 1959 年 4 月，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等 15 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到 257 万[39]。

随着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对农村体制的调整，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村生产力缓慢恢复，粮食危机逐步得到好转。但是，粮食紧张一直持续到夏收。

据卫生部、粮食部和内务部有关材料统计：1959 年春荒连夏荒，全国粮食紧张，农村人口近 3.6 亿严重缺粮，河北、河南、安徽、山东、广东、湖北、甘肃、贵州等省尤为严重。

1958 年冬荒～1959 年夏收，全国因饥荒死亡人数，约在 270 万左右，大约占整个大饥荒时期人口死亡数 5%左右[40]。

1959 年春荒人口达 9770 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 1949～1958 年各年平均值的 2.87 倍[41]。

1959 年春荒中，各地发生严重病死事件。其中，造成极大影响的，是“豫东惨案”。

豫东惨案涉及河南商丘和开封地区。大跃进中，豫东浮夸风极为嚣张。1958 年冬至 1959 年春，河南农村食堂普遍缺粮断炊，而豫东犹为其最，75%的食堂断炊半个月以上，其中 36%的断炊长达 1 个月以上。除干部和食堂工作人员小灶吃喝外，85%以上社员长期靠野菜、草根、观音土充饥。至 1959 年 3 月，豫东发生大规模浮肿、外逃和死亡事件，据中央内务部和国务院工作组调查，高峰时

期，豫东每天死亡达三四百人，严重的公社患病人数占 28（%）以上，全区逃荒要饭达 10 多万人，饥民遍及湘、鄂、赣、鲁、皖等十余省，许多逃荒者饿毙道途！接到大量人民来信后，因当时全国此类事件频发，中央捉襟见肘，拨发了少量粮食救济灾区。

大饥荒造成巨大人心震撼。春荒严重，食堂断粮，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发生公共食堂停伙，允许社员回家开伙情况。一些地方实行“挂羊头、卖狗肉”，食堂牌子照挂以应付上级，粮食分给农民回家开伙[42]。

随着毛泽东政策调整指示不断下达，各地推动农民家庭农副业生产、划分自留地等措施。而灾情严重的河南、安徽、湖北、广东等地，更出现农民自发分地耕种，或干部以承包形式分地给农民。其中，河南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其昌，提倡包工包产到户、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推行农业生产“地段责任制”，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下令无为县解散了四千多个食堂，开放自由市场。

中国农业改革初潮涌动。

回目录

3、“秦始皇亡国”与“向农民让步”

时间：1959 年 2 月～1959 年 7 月；

事件：1959 年 2 月，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 年 7 月，庐山会议；

1958 年秋粮超额征购，引发全国农村粮食危机。冬季，食堂普遍缺粮断炊；中央指示开展“反瞒产”，造成大饥荒空前大爆发，农村发生大规模逃荒、疾病、死亡，城市粮食供应和储备短缺；

毛泽东最初的意图，只是纠正大跃进中过火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他没有想到，“反瞒产”没有解决问题，严重的粮食紧张日益加剧，全国陷入巨大的粮食危机之中。他认识到：不改变目前的体制和政策，中共有“亡国”的危险。当此之际，毛泽东果断地采取了“向农民让步”的新政策。

1959 年 2 月 27 日～3 月 5 日，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调整和农民的关系，调整农业生产关系问题。

毛泽东提出：“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

之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他批评一些领导干部说：“他们误认为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回收。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他认为：“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他强调说，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基本的是要承认“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

在 3 月 1 日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所有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问题，并肯定了“瞒产私分”的合理性，强调对“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要刹车。

毛泽东将新思路概括为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赢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43]

其中，所谓队为基础，即以原来高级社为基础，改变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性质，这是从体制上对人民公社进行倒退性变革。

全国农村落实“十四条”，开展变动体制和清算“共产风”运动。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全国农村开始了以十四句话为指导的体制变动和清算“共产风”的运动。

随着各地普遍发生严重春荒，大量出现农民病死情况的上报和上书，毛泽东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加快了政策调整的步伐。

3 月 9 日，毛泽东向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发出《党内通信—关于召开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的六级干部大会问题》，告诉他们 3 月 15 日在上海召开政治扩大会议，各地应立即召开六级干部大会，“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要作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

3 月 15 日，毛泽东在武昌又发出《党内通信—关于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

问题》，说：在武昌找王任重和周小舟，谈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湖北主张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河南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南赞成河南的办法。各地要酌定。

3 月 17 日，毛泽东再次给他们发出《党内通信—关于召开县的五级干部大会和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问题》，指示各省、市、区，开完六级干部大会后，应召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要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鸣大放，辩论三四天。

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还指示，要告诉公社第一党委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

在上述讲话、文章、批示和文件中，毛泽东在强调大跃进的成绩与错误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同时，出于对形势和困难的判断，也提出了战略战术修正问题及其理由，并强调新政策出台、“向农民让步”政策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变秦始皇就危险，十三年亡国，隋炀帝三十一年灭亡”；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提出：“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这样一来农民就拥护我们了。”

1959 年 3 月 25 日～4 月 1 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题是工业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国家机构组成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要注重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问题。生产小队相当于初级社，这标志着他在农业体制问题上，迈出了更大的一步。此外，他还突出了对“共产风”要进行“算账”和退赔的问题。

4 月 2 日～5 日，中共召开八届七中全会。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调整了高指标，决定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候选人提名。

毛泽东在讲话中，初步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一些教训，强调实事求是的作风，提倡要敢说真话。

1959 年 5 月～6 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指示，恢复社员自留地，允许社员饲养家禽家畜[44]。

6 月 13 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表示：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粮食要分给本人，你愿意吃食堂，就自愿参加，不愿意可以不参加。6 月底他回到韶山，当乡亲们表示对吃食堂不满意时，他说“食堂不好可以散嘛”。他刚离开，韶山的公社食堂就散了伙。

大饥荒造成巨大人心震撼。春荒严重，食堂断粮，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发

生公共食堂停伙，允许社员回家开伙情况。一些地方实行“挂羊头、卖狗肉”，食堂牌子照挂以应付上级，粮食分给农民回家开伙[45]。

随着毛泽东政策调整指示不断下达，各地推动农民家庭农副业生产、划分自留地等措施。而灾情严重的河南、安徽、湖北、广东等地，更出现农民自发分地耕种，或干部以承包形式分地给农民。其中，河南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其昌，提倡包工包产到户、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推行农业生产“地段责任制”，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下令无为县解散了四千多个食堂，开放自由市场。中国农业改革初潮涌动。

农村政策改善，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刺激，至夏收，农业生产得到一定恢复，城市粮食供应紧张得以缓解，农村病死严重得以缓和。

庐山会议，全面否定了这一时期关于扭转困难局势的方向。

回目录

四、庐山之变："更大跃进"与更大饥荒

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无疑是严重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它根本改变了中共八大的政治体制，消灭了中共党内的政治良知，并以其举国暴政的大政方针，直接导致了随即而来的大饥荒和数千万人死难事件。

庐山会议后发源于中央、举端于地方、疯狂于农村基层的粮食暴力化征购政策、措施和手段，是造成1959年秋收，即将中国大陆推下举国大饥荒万丈深渊的直接原因。

1、庐山会议之变与更大饥荒探源

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无疑是当代中国严重影响历史进程的最为重大事件之一。它根本改变了中共八大的政治体制，消灭了中共党内的政治良知，并以其举国暴政的大政方针，直接导致了随即而来的大饥荒和数千万人的死难事件。

我认为，庐山会议后发源于中央、举端于地方、疯狂于农村基层的粮食暴力化征购政策、措施和手段，是造成在1959年秋收当即，即将中国大陆推下举国大饥荒万丈深渊的根本性直接原因。

这场大饥荒的灾难，直接导致了经年不息的举国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导致了数千万人的罹难。到1962年秋收，国家规模的大饥荒及其引发的饿、病、逃、死，才得以缓解和有效控制；直至1963年秋收，饥饿造成身患各种疾病的农村人口，才得以基本康复。

庐山会议的原主题是继续前期的调整政策，"纠正前期错误，继续进行调整"。

但就因彭德怀心系天下社稷家国，为民请命，奋笔上毛泽东万言书。一句几经斟酌而又轻描淡写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还是一针见血触动心病，触痛心痞，激起毛泽东勃然大怒！在国运人命、人性良知和个人意气、权势尊严的判定和选择之间，"伟大领袖"毫不迟疑地发动起一场"粉碎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运动，并将之扩张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

面对彭德怀笔触婉转的批评和建议，毛泽东认为这是不可饶恕的对其权力的挑战。随即，他针对性地作出了谋略周全而应对激烈的三大反应。

他以其最高权力者的身份，牢牢控制会议的话语霸权。7月23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扭转乾坤，开始批彭。8月16日，他在批示中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

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他先后在会议上做出《关于机关枪、迫击炮和其他》等报告，对与会者大加施压，扭转反左局面；

其次，紧急召集林彪上庐山，并明确表示出以枪杆子对付可能发生人心不测的后果，将以武力解决；

最后，他在会议上一再表示出“重上井冈山”，准备一旦局面失控，即不惜与党中央公开决裂，武力解决。

一句民谚反映了中国人面对暴力时的心态：“狠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毛泽东的霸气和匪气，有效地镇住了大局。在对于毛的权力和性格的恐惧下，中共中央领导人基本一致地改变立场，倒向毛泽东失去理智的威权。继林彪之后，刘少奇等大部分人转而积极参与了对彭德怀等持不同意见者的残酷斗争，而朱德等极少数人也在害怕毛泽东暴力威胁造成“分裂党”的后果，转身奉劝彭德怀放弃原则，无端让步。毛泽东自此之后，不断地以这种手段，来有效地控制中共中央，从而达到他控制全党的目的。

从此，庐山会议集中火力，转向以批判彭德怀为首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篡党夺权”的“军事俱乐部”。会议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会议对于彭德怀等人在会议上提出过批评的问题，以及毛泽东在前期调整和纠正时，所感到“压力”和不快的的问题，予以完全翻案和改变。会议以完全满足毛泽东的意愿与情绪为基调，全面否定了前期对大跃进造成严重困难局面进行的纠正和调整，并以全面恢复和发展毛泽东大跃进战略方针，来迎合毛泽东的个人意志。

会议通过《决议》，提出：“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决议》提出：“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在党中央和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一致，领导全国勇敢勤劳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毫不动摇地奋勇前进，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而斗争到底。”[46]

毛泽东取得了称心如意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则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空前灾难。

庐山会议通过的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公报》进而提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坚持政治挂帅，充分发动群众，

鼓足干劲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

会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中提出：“目前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深入开展轰轰烈烈的厉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的生产和建设计划而斗争……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

为迅速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掀起“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8 月 7 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团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潮的指示”，强调“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并强调：“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都必须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立即在干部中，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对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使干部和群众，在实事求是和认识一致的基础上，鼓足干劲，全面地掀起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用光辉跃进的成就，迎接国庆十周年。”[47]

在此后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中，对于这场“新的更大跃进”的提法，先后有“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光辉跃进”、“继续跃进”、“新的更大跃进”、“更大跃进”等。但此后更多地为各地实际运动中主要的称呼，大多以“更大跃进”冠之，以示对于大跃进以来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庐山会议，改变了 1958 年 10 月以后逐渐降温刹车，“压缩空气”，对农民实行清理退赔和让步调整的政策，确定了“反右倾”和“更大跃进”两大主题。

而从上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下到省、地、县、社各级党委和领导人，在（以）前一时期的讲话前一时期文章前一时期文件和指示精神分析，对于庐山会议确定的两大国策主题，上上下下都心知肚明：新的大政方针，必然祸国殃民[48]。

历史学着眼于以澄清过程真相和时期界定为基点的归纳、演绎，和由此上升的系统化、学科化，方可完成其“以史为鉴”，“鉴往知来”的功能及使命。

庐山会议，成为三大事件的分水岭：在社会性上，中共由其建国后一直朝向的民族利益目标，即实现中国的工业化[49]，向毛泽东主导下的权力斗争转变；在政治体制上，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原则”[50]，确立了毛泽东个人专权的地位[51]；在历史行程中，改变了对大跃进的修正调整，将中国社会，由大闹剧推向了大悲剧的灾难深渊。本文旨在揭示后者的历史真相和过程，总结其祸患和教训。

在党国体制下，个人独裁必然祸横当国，党内个人专断之灾，必然导致举国大难。毛泽东庐山会议的歇斯底里、雷霆万钧之怒，必然酿成如雪崩地陷、势不可挡的滔天大祸！

比较庐山会议后的形势而言，五八年的大跃进、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放“卫星”，这一切都还是在理想主义

大旗下的小闹剧，是小巫见大巫。庐山会议以后，闹剧变成了大悲剧！

“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正是这场大悲剧的起源和动因。

庐山会议后，在全党、全国规模的“反右倾” 运动中，“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受到进一步暴力性人身打击，均受到撤职处分和更大规模的批判斗争，长期受到专案审查。彭德怀被长期软禁于北京挂甲屯，“文革”初期受到中央文革唆使的红卫兵暴力殴打批斗，后死于长期残酷迫害。而周小舟因不堪人格和人身的暴力攻击和侮辱，1966 年 2 月 25 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1959 年 8 月以后，各级领导人处于庐山会议打倒“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震撼和之中，按照中央部署，主要开展“反右倾”；10 月以后，时当落实夏粮上缴和秋粮入库，以粮食征购为“中心工作”的“更大跃进”，成为运动的重点。

从 8 月上旬～9 月中旬，全国各省、地、县三级干部完成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省、地两级进行“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

中共中央在“反右倾” 运动时，对于前一调整时期，各地干部群众探索的对于人民公社体制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诸如“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自留地”、“自由市场”、“自家开伙”等行为，进行彻底的反攻倒算和“纠正”，重新恢复到创建人民公社的初衷：“一大二公”、“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部署“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团中央”开展“反右倾”。提出“右倾保守”和“右倾情绪”的范畴：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伟大成就，熟视无睹，对运动的缺点错误加以夸大，指手画脚，非难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大跃进，不是同群众商定可以实现的先进指标，认为指标落得越低越好。

8 月 9 日，中共辽宁省委上报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的报告》，将“怀疑、否定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并进而攻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认为大跃进是“冒进”，对“以钢为纲”、市场紧张、人民公社提出批评意见者。定性为“右倾思想”。 8 月 12 日，毛泽东在批示中说：“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把这种歪风邪气打下去。”

8 月 14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辽宁省委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对大跃进以来各项政策表示不满者，成为运动的斗争目标。

公共食堂是毛泽东乌托邦之梦的要点。8 月 5 日，在对《湖南省平江县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材料》批示中，他提出：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孙中山所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

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的事情。

于是，恢复原教旨的人民公社体制，成为“反右倾”核心。

9 月 29 日，中共河南省委上报中央《关于几个典型材料的报告》，将河南省委委员、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其昌在前期整社中，提倡人民公社包工包产到户、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推行农业生产“地段责任制”，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典型。

中共中央在批转该材料时提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人民公社的本心和实质，是根本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实质上是反对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表现。”[52]

10 月 13 日，中共中央批转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通知》，对在前一调整时期，各地干部群众探索和创造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改革措施，进行彻底的反攻倒算，定性为“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作法”。要求“凡有这种意见和活动的地方，都必须彻底地加以揭露和批判。”

同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在要求从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实现大跃进”,“掀起一个群众性的超产运动的热潮”同时，强调：“今年五、六、七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实际上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53]

当年 5 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中提出：可以给社员恢复一部分自留地。至此，不仅该项政策一风吹，而且许多执行者因此被打成“右倾”。

由此，全国各地的“反右倾” 运动，在集中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同时，对前一时期为克服困难、恢复生产、纾解民生而进行的部分调整的政策和措施，对前一时期为改变人民公社体制弊端曾积极探索和改革的各级干部，以及对大跃进以来各项政策表示不满的党员干部，进行了全面地、彻底地、暴力化的“纠正”、“清算”、斗争和批判，重新回复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

在此精神和原则指导下，庐山会议中央“反右倾”的同时，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首先从省、部委，继之在地、县委，随后在党内、并渐次在社会上全面发动和展开。

从 8 月上旬～9 月下旬，各省、地、县、社、队分别以上下级干部结合和各级干部会议的形式，完成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开展“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

8 月上旬～9 月下旬，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揪出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小彭、黄、张、周反党分子”。

如果说，从中央到部局级和省地级的“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主要侧重于“反右倾”，针对高中级干部暴力行为，主要侧重于对当事人进行精神摧毁、解除职务和人身软禁的话；那么，县级以下的“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则主要侧重于高指标、高征购的“更大跃进”运动，侧重于对当事人进行精神摧毁、解除职务和主要实施各种骇人听闻的人身暴力行动。

从中央到省、地、县、社、队，据我的不完全统计，这场反“右倾”运动中，有良知、讲真话的党员干部，大约 370 余万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饱受苦难。因其内容和时间上与高征购混为一体，故本文对于县级以下的“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在下面进行详述。

回目录

2、“更大跃进”，高征购与更大饥荒爆炸性发端

更大饥荒第一阶段，1959 年 9 月下旬～1960 年 3 月。

按其历史特征，又可以划分为如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9 年 9 月～1959 年 10 月，“反右倾”政治斗争在党内外发动进行，暴力化泛滥。

第二阶段：1959 年 10 月～1960 年 3 月，“反右倾”　和“更大跃进”运动，在农村演变成为暴力下的高指标与高征购；大饥荒祸横。

标志事件，即为 1959 年 8 月下旬，庐山会议下阙～1960 年 4 月，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前夕。

庐山会议后，中国社会，再次陷入昏妄狂热之中。“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成为全党的“中心工作”。“反右倾”运动，上上下下采取了严重的暴力化手段进行政治斗争，造成党内和社会上的高压恐怖；“反右倾”和“更大跃进”二者互为交汇策进，上下各有偏重，而最终落于为达到“更大跃进”目标的粮食征购。

暴力催生的高指标层层升级，暴力血腥的高征购，达到大规模惨绝人寰的程度；为完成高指标下的高征购任务，农村基本实行“先国家，后集体；先征购，后口粮”的措施，即就地收割，就地征购，就地入库，入库封仓。致使时当秋收之际，公共食堂即告粮荒；即使如此，由于征购任务的高指标与粮食实际产量相去甚远；为此，在中共中央部署下，全国农村进行了大规模的“反瞒产”运动，

这是一场赤裸裸的大规模暴力化运动，造成大量骇人听闻惨案。

“反瞒产”运动的结果，造成 1959 年秋收的粮食大部入仓，农业人口生存所需粮食难以为继，许多地区粮食搜刮一空；这就导致了一些地区从当年秋收后即陷入饥荒；1959 年的发端于农村的冬荒愈演愈烈，至 1960 年春荒大爆发，全国陷入粮食严重匮缺的大饥荒灾难之中，农村人口发生大规模疾病、逃荒和死亡，城市发生严重粮荒。至 1960 年 3 月，毛泽东又发动起“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

而对于这一阶段的历史真相，举世之间，鲜有披露。在此，我将以过程揭示为要，告诸世人，那是一场怎样惨无人道的血腥悲剧！

回目录

（1）“反右倾”的暴风骤雨与农村鸣放

庐山会议后，全国各地掀起大规模的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群众，竟然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成为这场以暴力为动力的政治运动受害最深的群体之一。

农村基层的反“右倾”运动，大多从 9 月中旬开始。

运动的步骤，是“先党内、后党外”，运动的策略，是“引蛇出洞”、“诱敌深入”。即“先鸣放，后算账”。[54]

农村基层在大多数地方，先后以“社教运动”（河南、湖南、山西等地）、“整社运动”（四川、广西等地）“整社运动”（湖北、江西）等名目展开。让“对三面红旗不满”者，“先鸣放、后整风”。

举广西及柳州地区，以及放出水稻亩产 130434.14 斤、日产万吨钢“卫星王”的环江县为例，可见全局。

9 月 13 日至 27 日，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第一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和区、地（市）、县三级干部大会，学习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全区开展反“右倾”斗争。

桂林地委书记王斌吾因在前期调整阶段对于落实退赔、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比较积极，并说了几句事关民生的实话，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判、撤职。

会议修订后的 1959 年工农业生产指标为：粮食总产 160 亿斤以上，提前五年达“纲要”，人均有粮 1200 斤，油 9 斤，工业总产值 16.5 亿元，铁 4 万吨，煤 300 万吨。会后，全区“反右倾”运动，处分干部万余人。

10 月下旬，柳州地区召开地、县、社、队四级干部大会，全面部署农村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引蛇出洞，全面发动，耐心启发；人人鸣放，畅所欲言；统一行动，打击从严。

应该说，大跃进以来的巨大灾难，已经现实地暴露在全党全民眼前，1959年上半年纠风整社，社会民心的不满情绪也充分表达，上下皆知。

但对庐山会议后形势逆转，广大农民知之甚少；“社教”运动号召大鸣大放。大跃进以来广大群众受苦受难，干柴烈火，一点就着。全区农村迅速掀起大鸣大放高潮。

1959年11月19日，中共广西自治区委《批转柳州地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报告称，四级干部大会后，社教运动在“全区326个公社，2791个大队，已全面铺开。到14日止，全区已有80%左右的大队形成鸣放高潮，进展较快的鹿寨、米宾、柳城、南丹、环江、柳江等县，90%以上大队进入鸣放高潮。据16个县初步统计，到12日止（有4个县只统计到10日），参加鸣放的共达145万人，占农村成年人口的96.26%，已鸣放的116万多条，占参加鸣放人数的80.28%，占农村成年人口的77.33%，到15日止鸣放面达到农村成年人口的90%左右。共鸣放出各种意见654万多条，多的有一个人鸣放30多条意见的。

“其中，正确或建设性意见占52.31%；认识模糊占23%；错误意见和反动言论占24.69%。问题性质来看：大部分是集中总路线、人民公社、粮食问题、市场供应、八字宪法，党的领导、干部作风等上面。据柳城49万条意见排队，属总路线，大跃进的占12.5%，人民公社13.1%，粮食问题28%，八字宪法8.7%，食堂和其它生活福利11.4%，党的领导12.5%，干部作风4.8%，其他9.4%。

环江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大鸣大放，也搞得如火如荼，对“三面红旗”，民怨冲天。

“卫星王”所在的红旗公社，鸣放集中在公社化、共产风、放卫星、大炼钢铁、高征购、吃食堂、断粮断炊、浮肿死人。

在“卫星王”发射地红旗公社本乐大队鸣放中，364人对放“卫星王”、“共产风”、干部作风和政策造成饥荒，提出意见1600多条。

有的说：“给地主干活，做细活、重活，逢年过节，地主还要巴结做工的，买肉打酒，让你吃饱喝足了好好干活，田里才长庄稼。共产党拿人不当人，尽让你干活，不让你吃饭，恨不得天下田里都是亩产十三万斤，国家全拿走，城里人和干部吃得舒舒服服，好吃好喝，农民一粒粮不吃，全交回（国）家才好。这么干，社员哪里有命在？我看共产党只管干部和城里人吃饱吃好，不管农民是死是活。”

有的说：“刚解放，共产党的干部和和气气；合作社，共产党的干部神神气气；公社化，共产党的干部浑身杀气。动不动就罚饭，打人。哪朝哪代，老百姓遭的罪也没有现在多。自古以来，受灾了朝庭就要放粮，饥荒了就要赈灾，地主

老财都施粥舍米行慈善。现在可好，尽说人民公社是天堂，还天堂呢！饿死这么多人，干部一出门，路上都是浮肿病人，不该看不见吧！食堂几个月都不冒烟了，社员光吃野菜，干部还抄家查粮，连人性也没有了。”

还有人说：“共产党的干部就是土匪也不如，光晓得搜刮百姓，一点仁慈也没有。土匪抢劫还给人留个路费钱，现在可好，饿死这么多人，干部就只管抄家抄粮，粒米不留！”

对此，环江县委书记洪华认为，这是坏人利用党的整社之际，向三面红旗发起猖狂进攻，恶毒攻击我们的党，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骂我们大跃进搞糟了，骂我们人民公社刮了共产风了，骂我们大炼钢铁劳民伤财，跟秦始皇修长城一样了，骂我们公共食堂断了老百姓的生路了，骂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断子绝孙、比国民党还坏了。总之，比蒋介石骂我们还凶。我们共产党被国民党骂了那么多年，越战越强，还怕你骂么？可耻的是，我们共产党干部中，听到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仅无动于衷，还有人随声附和。这次反右倾，要引蛇出洞，先让人家骂，骂得越凶越好，等你骂完了，我再下手，打蛇要打在七寸上……。

据统计，全县在职干部中，有 135 人被划为“右倾”分子，重点批判 87 人，警告 7 人，开除党籍 2 人，撤消职务 2 人，开除公职 6 人，打成严重“右倾”16 人，其它处理 14 人。对上述人员，分别实行了批斗、辱骂、推搡、扇耳光、揪头发、捆绑、毒打、吊死猪、灌粪、刀砍等毒刑。

而在“反右倾”运动中，环江县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斗争、毒打的农民群众，则有案可考，无数可计了。

用洪华的话来说，环江县的“反右倾”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55]

在湖南的重灾区之一，我的家乡澧县，“以斗带批”的声势令人胆战心惊。1959 年 10 月，澧县县委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正式开展全县“反右倾”运动，至 1960 年 1 月结束。

全县共批斗“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和“右倾保守势力”3290 人，重点批判 23 人，处分 112 人，斗死 241 人。

从县到社，各级“反右倾”大会声势浩大，普遍采用“辩论”、谩骂、揪头发、扯耳朵、捆绑、推搡、罚跪、冬天泼冷水、毒打、吊打、墩人、灌屎、灌尿、灌辣椒水、灌肥皂水、棒打棍揍、皮带抽、背磨盘……[56]。

全国的运动概况，莫不如是，不同的是，用刑的程度和花样各有千秋罢了。

很快，运动转入“与粮食征购任务结合”的“更大跃进”。

回目录

（2）暴力高征购的四大政策

“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风行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反右倾”运动，上上下下的暴力化政治斗争，造成党内和社会上的高压恐怖。暴力催生的高指标层层升级，暴力血腥的高征购，达到大规模惨绝人寰的程度。

为完成高指标的高征购任务，全国农村实行“先国家，后集体；先征购，后口粮”政策，相当地区实行“四就”，即就地收割，就地征购，就地入库，入库封仓。

此一阶段，呈现出“三化”特点：政治斗争暴力化，粮食征购绝户化，人口病、死爆炸化。

为推动“更大跃进”，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公报》制定了“今年的跃进计划”的新指标：“经过核实，一九五八年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五千亿斤，今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应该作如下的调整：钢的产量为一千二百万吨；煤的产量为三亿三千五百万吨；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一九五八年核实产量的基础上，各增产百分之十左右。”[24]

《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称之为“目前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中心任务”。

庐山会议后，中共中央敲定以“五千亿斤…增产百分之十左右”的基调来安排 1959 年粮食征购。

1959 年粮食实际产量为 3400 亿斤，1960 年为 2870 亿斤，年平均递减 15%。[23]

1959 年 10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举国上下再次掀起了一阵放“卫星”、高指标的浮夸风。为了证明“伟大领袖”制定的“三面红旗”决策的英明正确，为了证明“右倾反党集团”只是恶毒攻击和诬蔑诽谤，“更大跃进”运动，就担负起了其涂脂抹粉的使命。然而，这些空中楼阁的谎言，需要来自农村“丰产粮食”的支撑。各地纷纷开始全力以赴地投入层层加码、步步拔高的粮食高指标和高征购。

就在粮食减产的情况下，1959 年 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力争完成今年对外贸易的收购任务和出口任务的紧急指示》，强调“完成对外贸易的收购任务和出口任务，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重大问题”，“影响我国的对外信誉”。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紧急地动员起来，抓紧今年最后的六十多天，采取突击的方法，力争完成今年对外贸易的收购任务和出口任务。”

按照“五千亿斤“的指标，1959 年全国粮食实际征购量和出口量，分别达

到建国以来最高的 1348 亿斤和 83.2 亿斤！约占当年粮食产量的 39.6%，[23]接近是 1957 年粮食实际征购量占总产量的 17.4%的 2.28 倍。

随即，国家计委和粮食部将征购指标分解落实到各省、市、自治区。

1959 年的粮食征购，唱起了三部曲：

第一步，高指标，高征购；

从中央到地方，上级定下粮食征购高指标；而为表示超额实现“更大跃进”，下级必须上报更高指标。一级压一级，层层加码。

第二步，就地收割，就地征购，就地入库，入库封仓。

为了搞到粮食，从中央到地方，一再强调先国家后集体，先安排征购后安排生活。由此而来，绝大多数地区采取措施，在收割时边收边征的四大政策：即就地收割，就地征购，就地入库，入库封仓！

在“先国家，后集体”的政策性口号下，在人民公社体制之下，各地普遍实行了“完成征购任务，再留口粮，种子粮”的政策。而在“更大跃进”口号下，完成高额征购任务后，农民的口粮，种子粮所剩无几。许多地方，收割下来的粮食，全部变成征购粮，还不够完成征购任务！秋收之后，直接造成了公共食堂缺粮断粮，而在无论男女老幼，一律吃食堂的广大农民，也由此断粮！

除西藏和新疆我情况不明外，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其它地区普遍推行“就地征购”。其中，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甘肃、四川、湖北、湖南、江苏、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许多地区，纷纷提出“颗粒归仓”的口号。

“就地收割，就地征购，就地入库，入库封仓”政策，是当年造成广大农村普遍缺粮，进而发生大规模饥荒死亡的根本性原因所在，也是长期为漂浮于依据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来研究大跃进史专家们的盲区所在！

第三步，武装护粮。

由于个别地方出现饥民偷粮抢粮现象，全国各地普遍实行武装护粮，即派军队、警察、民兵武装守护粮仓粮库。一些地方下令，若有偷粮抢粮者，就地正法。农村各地也大量发生饥民偷青而被打死的事件。

还是以广西、柳州、环江县为例。

对 1959 年广西粮食产量，自治区定为 460 亿斤（实际产量为 108 亿斤，指标为实际产量的 426%），比大跃进发端的 1958 年还要翻一翻。

柳州地区的粮食产量，地委定为 110 亿斤（实际产量是 17.5 亿斤，指标为实际产量的 629%），比 1958 年翻一番。

环江县的粮食产量，根据地委精神，洪华定为 9.6 亿斤(实际产量为 8280 万斤，指标为实际产量的 1159%)，比 1958 年指标翻两番。庐山会议后，区、地、县的指标虽略有下调，但面对严重减产的局面，这样的“高产”指标万难实现。

1959 年，按照洪华认定的高产指标，环江的征购任务定为 7100 万斤贸易粮，即交原粮 1 亿斤。把当年全县生产的全部粮食 8280 万斤，悉数上交，也还差 1720 万斤！

环江按粮食亩产 800 斤指标压下去，要各公社依此例上报，全县 30 万亩粮田，各社上报产量共计 2 亿 4000 万斤。这样，上面把征购任务调整为 3850 万斤贸易粮，约合原粮 5423 万斤。

10 月 20 日，洪华在地委三级干部会上报喜说，环江完成国家征购任务 3880 万斤贸易粮。红旗，洪华又扛回一面。但实际入库只有 3516 万斤贸易粮，约合原粮 5028 万斤。征购率占当年粮食产量的 60.1%。

粮食交不上来，征购任务完不成，洪华恼羞成怒。洪华一手高举"右倾"分子帽子，一手大抓"反瞒产"。

从 1959 年秋收以后，环江县开展以"反右倾为纲"的反瞒产高潮。凡是报不出"瞒产私分"粮数的干部，一律视为"富裕农民"、"大跃进逃兵"、"瓦解人民公社"，施行残酷斗争和打击。

1959 年 12 月 21 日，在环江县群英大会上，洪华全面安排反"后手粮"斗争。他提出，要把"反瞒产"，作为反右倾的主要内容。农村要以反"瞒（产）、私（分）、贪（污）、盗（窃）、外（捞）、破（坏）"六个字为中心。

洪华说，今年确确实实的高产丰收。粮食为什么交不上来，因为从干部到社员，都有资本主义思想和本位主义在作怪，不愿把粮食交给国家，瞒产私分，贪污盗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激烈，阶级敌人乘机破坏。

洪华提出 "反瞒产"政策："带头欢迎，自报不咎，揭发有功，抗拒从严，挨户落实，点头承认，永不反悔，远征协作，集中煮饭。"

会议规定，各公社要开展起声势浩大的反"后手粮"运动。运动的方法是，以大队为单位，以报高产的小队为标准，其他小队对照挂钩报产量。凡达不到的就是瞒产私分，就要进行批判斗争。

会议揪出一大批县、社、队干部，作为右倾"瞒产"典型，进行大、小会批斗。洪华吩咐："批斗会要伤筋动骨，触及灵魂。"

批斗会上，积极分子一涌而上，拳打脚踢，罚跪，揪头发，煽耳光。"不老实"的捆绑吊打。与会者为了证明自己斗争积极，对被斗对象大打出手。会议打人成风，打人者下手越重越英雄。

被打的人只好胡说八道，承认藏了"后手粮"，按揭发数字答应交粮的，便被释放。交不出"瞒产粮"，继续批斗殴打。斗完后关起来，不给饭吃，直至交粮。

运动开展不久，阻力很大。县委决定，查"后手粮"运动，要象打仗一样。于是，县、社大量调动武装民兵，荷枪实弹，挨家挨户搜查粮食。

武装收粮队荷枪实弹，冲进一家抄一家。没粮，先把人捆起来。吊在屋梁上严刑拷打。打人的手法五花八门：反手背吊——双手反过背去五花大绑，吊上屋梁；倒挂金钟——用绳子捆紧两脚大姆指，挂上房；吊死猪——称钩穿进肩胛骨，吊在树上；用马刀在人身上一块块割肉，问一句割一刀；伤口中搓盐；耳朵中塞炮仗，不交粮，点燃引线……。

当时，绝大多数社员家早就粮尽食绝。公共食堂，餐餐只有野菜和糠皮。有的人家，千方百计弄了一点可怜的粮食。搜出来，就是一场大祸。

吉祥公社北宗大队干部，在抄家搜粮时，发现一户人家锅里有稀饭，便断言这家私藏“后手粮”。主妇出来争辩几句，当即被干部命令民兵捆起来吊打，非让她交粮不可。听说没有粮，这伙人从粪缸中舀来人屎，又找来狗屎，撬开她的嘴巴，硬灌了进去。

酷刑难当，受害者只好承认自己在山后的岩洞里藏了“后手粮”。民兵去搜，一无所获。带队干部大怒，吩咐吊起来再打，又亲自舀来一大罐粪屎，撬开嘴巴使劲灌。那妇女只好又招认有粮，藏在山里。搜不出来，回头又打又灌屎。如是几番，这位妇女被活活打死。大队干部骂了一通，带人扬长而去。

为掏出粮食上交国库，保卫“三面红旗”，县委按照自治区委统一布置，把公社集体仓库作为“三留”的粮食（种子、口粮、饲料粮），作为上交征购任务，并入国家仓库。

集体、国家的粮食仓库统统封闭，公社食堂断粮绝炊，而公社、大队干部无权开仓；洪华严令，“死人也不动摇，一定要拿到粮食交国家！”

自从公社化后，社员只能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私人不准有粮食。口粮全部由生产队和大队干部掌握，定期从集体仓库中称给食堂。集体小仓并入国库，公共食堂彻底断粮，环江人民也就彻底断了口粮！

就这样，全县的征购任务也只完成 3156 万斤贸易粮，约合 4445 万斤原粮，占全县粮食总产量 8280 万斤的 53.7%。全县 16 万社员的口粮，30 万亩耕地的种子，和几万头猪、牛等牲畜的精饲料，只剩下 3755 万斤粮食。若按正常一亩地留种籽 20 斤，一头猪、牛留饲料粮 50 斤，则共需粮食 1335 万斤。全县只留口粮 2420 万斤，人均口粮不到 150 斤。若 3755 万斤全作口粮，人均一年只有原粮 234 斤，按出米率七折计，折合 183.8 斤，人均每天半斤粮。

人们只好以挖野菜充饥，偷青、偷仓不断发生。

小仓并大仓以后，广西从上到下，层层宣布封仓。环江县委明令宣告，开仓的一律开除党籍，偷粮的开枪击毙。全县因断粮，扒仓库、偷粮食而被打死的有几十人。

龙岩公社粮管所干部抓到一个饿急偷粮的学生，决定他把就地枪毙，以杀一儆百。干部下令把这个 12 岁小孩按倒在他偷粮的地方，开枪射击。小学生在枪

口下苦苦哀求饶命，哭喊声撕心裂胆。杀人凶手换了三次子弹，扣了八次枪机才把枪打响。小孩被一枪打中，倒在地上，鲜血四溅。三天后不治死去，成为高征购和反瞒产的牲祭。

吉祥公社北宗大队大队长，捉到一个偷粮的小孩，毒打一顿后，竟把他关进密不透风的仓库里。待父母和其他群众闻讯赶来时，这个饿得皮包骨，打得血肉横飞的小孩，早被活活闷死了。

而洪华因大放“卫星”有功，被当作自治区委重点培养的典型干部。又因在1959年下半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中的“成绩”，1960年3月5日，洪华被提拔为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兼任环江县委书记”！（ ）

回目录

（3）绝户征购的“反瞒产”运动

秋收的粮食入国库后，仍然达不到指标数字。于是，全国规模开展了以搜刮所谓“后手粮”、实则为公共食堂库存口粮，以及所谓社员家中“私藏粮”为目标的“反瞒产”运动。一些地方进一步发动“清粮食、反右倾”、“反偷风”、“清查退赔”等赤裸裸的暴力运动。

庐山会议后，中共中央多次在有关文件中特别强调，大跃进取得了伟大成就。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借粮食问题向党发起“猖狂进攻”。富裕中农也要（在）隐产瞒报。因此，农村必须进行“反瞒产”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于是，从中央到省、地、县、社、队，层层落实，大搞起“反瞒产”。

首先，“反瞒产”运动针对农村各级干部，上报产量达不到上级领导的征购任务，立即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判斗争，残酷毒打，直到报产数字满意为止。

其次，“反瞒产”对社员群众造成滔天大祸。在1958年冬至1959年夏季人民公社的整顿和调整中，因公共食堂缺粮，许多地方允许回家做饭，在夏粮收割后分配了一些粮食给社员群众。因此，“反瞒产”运动很快变成主要是针对社员群众的抄家搜粮运动，要把这一部分粮食从社员手中搞出来，以充征购任务。

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甘肃、四川、湖北、湖南、江苏、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武装征粮的事情，即由干部们率领全副武装的民兵和积极份子，荷枪实弹下乡“征粮”。

对于这样一场灭绝人性的“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及其“反瞒产”运动的暴力性质，信阳事件主要责任人路宪文在检讨中说的话，最具有典型性：“不

满就斗”。而引发信阳事件曝光的光山惨案主要责任人、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的认罪交代，则更加形象具体：“不满就斗，有斗必打；不交（粮食）就斗，有斗必打。”[23]

为了搞出粮食，这些武装征粮队，以极端暴力手段，对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为了逼问出粮食，干部们采取的刑法有捆绑、毒打、灌屎、穿糖葫芦（用削尖的木棒从人的屁眼捅进去）、活埋、点天灯、放起花（在妇女阴部插上震天雷，点燃爆炸后血肉飞溅）、五马分尸……[余习广：《伏尸百万搏天国：信阳事件全景揭秘》，余习广主编：《大跃进·苦日子研究丛书》（7）]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从农村挤压和搜查粮食，完成高征购。

让我们从这场大灾难中死人最多的省份四川，以及“反瞒产”力度最大的涪陵地区和全国死亡率最高的县份荥经着手，来看一看暴力夺粮如何造成大灾难，以及大饥荒起源之际 1959 年冬荒至 1959 年春荒的实况。

1959 年四川的粮食实际产量为 316 亿斤，比 1958 年减产 132.7 亿斤；当时公布为 700 亿斤，浮夸比例为实际产量的 221.52%；当年征购量为 154 亿斤，征购量高达粮食实际产量的 48.74%！

该年，四川的粮食征购任务极其沉重。在秋收之际，该省实行了“边收割、边征购”的政策；而涪陵等大多数地区，实行了严格的“就地收割，就地征购，就地入库，入库封仓“政策。即使如此，也远远不能完成征购任务。于是，涪陵地委决定乘“反瞒产”的“东风”，“加强工作力度，完成今年的粮食征购任务。

涪陵地委负责人认为：1959 年，涪陵地区的粮食大丰收，造成当前粮食征购紧张的根源，就在于干部群众的右倾思潮和本位主义，“普遍瞒产私分”。因此必须深入开展、加大力度地进行“反瞒产”。并为“反瞒产”定下“规矩”：谁反不出粮食谁右倾，就要把他拿下来，撤职查办。

10 月初，涪陵地委召开第十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在涪陵地委负责人“典型开路，样板示范”的鼓动下，各县委书记搞“人人过关”，“落实产量，上报数字”，达不到指标者挨批斗。会议上发生县委第一书记因为报数字“右倾”，被揪斗殴打致伤事件。

这次典型开路，为全地区暴力化“反瞒产”，做出了“样板示范”。层层比照，级级照搬，一时打人成风。

11 月，涪陵县委召开万人大会，发动大规模“反瞒产”。会上，县委纵容毒打一位“右倾保守”的区委书记。

丰都县委在上游公社召开“反瞒产”现场会，调集区委书记及县级科局长到会参加“观摩”。会议由县委负责人主持，对报数字“右倾”的社队干部实行“触动”性批斗和毒打。当场吊打声称“实在完不成任务”和“瞒产私分”的支部书记杨得芳等 9 人。时隔两天，上游公社依样召开现场会，当场逼迫基层干部承认

“大丰收”后的征购任务。对于达不到高指标者，一律扣上“瞒产私分”帽子，施以毒刑。现场会吊打 67 人，当场打死大队和生产队干部 3 人；毒打后 2~7 天死亡者 10 人。

高压下的干部，回队即对社员加倍实行毒刑下的“反瞒产”和“清算退赔”。对 59 年夏收和秋收前分给社员的粮食进行“算账退赔”，“有钱赔钱，无钱拆房搬物”。

在丰都县，这场“反瞒产”运动一直延续到 1960 年 4 月。全县被斗争和打死的干部 476 人，没收家产 11900 户，收缴现金 5.24 万元、公债 2.43 万元，罚款 5441 户计现金 11.79 万元，撤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 1173 人，各区私设劳改队 48 个，先后关押 724 人，县政法部门关押劳改“涉案瞒产私分”、“右倾保守”和“本位主义”的干部社员 2304 人。

涪陵地区的“反瞒产”运动，在垫江、涪陵、南川、石柱、丰都五县，“挖出” 5.56 亿斤“瞒产”粮食。

由于“反瞒产”运动“挖出”的“瞒产”粮食离高指标仍有相当距离，2 月初，四川进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涪陵地区上下动员，“深挖很批”，再次“挖出”“瞒产”粮食 5.3 亿斤。[涪陵地委政策研究室　赵笃清、葛明琪、王杰军、石有斐：《一九五九年涪陵地区的“反瞒产私分”》，四川省农村合作经济史料”编辑组编：《四川省农村合作经济史》]

回目录

（4）“反偷风”、“挖潜力”运动与“用专政促运动”

一些在大跃进年代中曾领略风骚的县市，别出心裁的县委负责人，在“反瞒产”运动尚未能完成征购任务情况下，创造性地发明了诸如“反偷风”、“挖潜力”之类的“清算退赔”运动，即对农村基层干部实行“反瞒产”，逼迫上报高产量；对农民实行“挖潜力”、“反偷风”， 即对调整时期农民自留地、副业、夏季“多分粮食”进行清算，以及将社员偷青、偷粮普遍化，折粮折钱折物退赔。

湖南澧县是得到上级表彰的“反偷风”运动典型。

为在 1959 年取得“更大跃进”的“伟大胜利”，在全省开展的“反瞒产”运动中，澧县县委独具匠心，在全县开展了一场来势凶猛的“反偷风”运动。

1959 年 10 月，澧县县委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县委第一书记马书玉认为：从 1958 年到 1959 年，澧县粮食生产取得了大丰收，理应超额完成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但是，从春荒到现在，各公社不仅完不成国家征购任务，反而大闹粮荒，不是喊饿死了人，就是说食堂断伙，社员饿得要死了，一直闹到天昏地暗！现在

看来，这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起的猖狂进攻。不把社会主义制度和三面红旗砍倒，他们是决不罢休的！因此，我们一定要誓死保卫三面红旗，誓死打赢当前的粮食征购这一仗！

马书玉在县委书记处会议上，对与会者说，1959 年秋收在即，各位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就是死也要完成今年的征购任务。现在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大丰收！闹粮原因，主要是农民在平时偷青、偷粮造成局部减产；秋收时把粮食偷回家备饥荒了。此外，干部中自上而下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和本位主义思想，生怕留少了口粮，又会发生今年春荒的闹粮缺粮饥荒病死情况，大量隐瞒产量，以多报少，欺骗上级。因此，必须在全县开展以“反瞒产”为主，以“反偷风”为辅的“人民战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账要算清楚，新账老账一起算！退赔要兑现，有粮退粮，有钱退钱，拆屋掀房，也要把吞下去的粮食给我吐出来！

1959 年 10 月 11 日～17 日，澧县搞起了由干部带头压阵、武装民兵和积极分子开路的“反偷风”运动，把全县队队户户闹了个鸡飞狗跳墙。

工作队下到各公社，首先选择典型，召集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开会，对曾经在偷青或偷粮时被抓获的社员进行“摸底”，并交待“算账”政策：一次偷盗时的数量×180 天=退赔数。然后召开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四级大会，布置队干部和积极分子，对“偷盗集体财产和偷青”的“阶级敌人和破坏分子”进行清算。对不承认的“坏人”，实行“毫不留情地坚决斗争”，毒刑上身。对于承认偷盗的，坚决进行清算退赔。有钱折钱，无钱搬物拆房！

据 1960 年 6 月 18 日，中共澧县县委整风办公室上报地委并省委《关于我县产生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错误的检查和对马玉书、赵全志同志的处理意见的报告》称：“反偷风”运动中，“全县范围内、普遍的发生了打人、打死人和逼死人的现象。”“全县被打的干部群众达 19041 人，占农村总人口的 2.88%。其中因干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致死的 520 人（整党、整社中死的 102 人，水利工地上死的 177 人，去冬今春和社会主义再教育死的 241 人）。这些人属于当时被斗打致死的 99 人，斗打后自杀的 140 人，原来有病打后加速死亡或者是斗打成疾致死的 117 人，扣饭后自杀的 127 人，因克扣粮食而饿死的 45 人，其他 92 人。”

“全县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严重的有王家厂、闸口、白衣、澧阳和梦溪公社。这五个公社共打人 10823 人，占全县被打人的 54.6%，因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而致死的 258 人，占全县死人总数的 49.5%。”

这些干部“有意为非作歹，摧残群众，危害人民，手段非常毒辣。体罚毒打群众的手段汇集起来，有 40 余种。如：‘推排球’、吃屎喝尿、‘吊半边猪’、针穿嘴巴、棍穿阴部、男女互咬生殖器、坐水牢、火烧、打后赛跑、人碰人、拔牙齿等酷刑，都是骇人听闻的。有的地方错误的提出‘杀鸡吓猴’、‘打一警（儆）

百’、‘堆罗汉’（被打人睡在下面，上面压人），和成立‘殴殴组’（殴脚筋、手筋、腰筋）、打态度组（辩论对象在斗争时，一上台就打，把态度打老实）、开攮攮会（把人推挤）。”

1961年4月，县委书记张琢在中共澧县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中说：“反偷风”运动，发生了“全县性的非法抄家和非法斗争的违法乱纪现象。”

“全县当时有18个公社、317个大队，在‘反偷风’中开展了斗争的有291个大队，占94.7%，被斗对象11263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非法斗打或采取其他办法被体罚的共389（？）人。斗争中，干部违法乱纪的有792人，占全县作业组长以上干部的0.94%　。（”）

“不少地方发生了错斗乱打的现象。与斗争的同时，各地普遍发生了非法抄家现象。全县有267（？）个大队，占86.97%的大队搞了‘抄家’，被抄的有997户，占总户数的6.8%，……共抄出粮、棉、衣被等各种实物折款达70040元。更严重的是有的地方在‘抄家’中还普遍采取了连抄家带拆屋、抄后封门、扫地出门等恶劣手法。”

“除了随随便便打人、骂人、吊人、扣粮、扣工分、罚趴、斗争、‘辩论’、反省、搜查、抄家、游行示众、戴帽子、罚跪、罚站、罚晒、罚吹西北风等等以外，还使用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手段。他们私设法堂，严刑拷打，刑罚之多，有如画地为牢、坐水牢、泼冷水、滚雪球、跑‘麻城’、叫女人赤身裸体、男女互咬生殖器、开朗诵（推搡）会、推排球、拔胡子、扯头发、吊‘鸭儿水’、抬‘穿心杠’、脖子上挂屎桶、跪碎瓦渣、叫人家喝清尿、吃牛屎、剁指头等等。”

这场运动的后果，据张琢在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称：仅1960年4月前，全县外流逃荒的即达15876人，全年发病人数高达261500人！逃荒、病、死者，占全县人口的42%！[26]

所谓“挖潜力”运动，就是在完不成高征购任务情况下，河北、山东等地，针对社员“私藏粮食”开展的“算账清退”暴力运动。当地农民称其为“还乡团的反攻倒算”。

河北吴桥县桑园大队大观李生产队，1959年上半年分配给社员自留地。其中7户社员在自留地里种谷子，共收获719斤，各家共吃了100多斤。

生产队因高征购，造成是年冬季粮食紧张。于是开展“挖潜力”运动，向社员“反攻倒算”查粮食帐。在社员大会上，干部硬说这7户社员的谷子是偷的，谁不交出来就“辩论”。用“熬鹰”（即不让睡觉）、“辩论”、斗打、翻箱倒柜抄家的办法，连续批斗四五夜，逼迫7户社员交出剩余的谷子才算作罢。[中国河北省委组织部：《吴桥县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情况》，1960年8月1日]

此外，还有各种名目下的形形色色运动，而“用专政促运动”，更是山东、贵州、浙江、江苏、河南等地的“创造”。

1959 年 12 月，山东益都县委决定“大打一场反瞒产私分人民战争”、“大打一场围捕反革命人民战争”的捕人运动。

仅在 1960 年第一季度，该县即逮捕人犯 2048 名。2 月 26 日～3 月 23 日，即捕押 876 名；第二批 3 月 24 日～ 28 日，捕押 786 名。全县 21 个公社，集中捕人的有阳河、敬仲、城关等 16 个公社，捕人百人以上的有张孟等 7 个公社。

捕人的罪名与构成：“1，捕了不该捕的地、富、反、坏分子和一般汪伪身份 637 名，占 38.39%；2，一般劳动人民中，有小偷小摸行为、占小便宜、及因生活安排没落实而剥了一些榆树皮吃，砸死自己喂养的猪吃或有一些不满言论等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作反革命以打击。属此类的 705 名，占 41%；”

“结果助长了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许多干部认为多捕人工作就好作了，要求多捕人，以大捕大抓代替发动群众。如口埠公社提出‘苦战一昼夜完成捕人任务’，一天搞好 100 多份材料。而捕人少的公社，在停止集中捕人后，则埋怨搞晚了，没跟上趟。个别基层干部趁机乱打、乱押、乱罚、乱翻、乱没收现象相当严重。郑母公社霍陵生产队提出：‘农具还乡（一切收归生产队），家具大搬家’口号，15 小队 64 户，几乎全部被抄家。霍家庄小队也因未找回外流人口而有 64 户被贴上封条。该社黄楼村社员牛景美，3 月 27 日到店子村偷 70 余斤地瓜种，被社队干部和民兵抓住活活打死。”

“由于大量捕人，造成监狱人满为患，由于卫生条件差，管理不善，关押的 200 余名老弱病残，3（月？日）～3 月 20 日死亡 56 名。其中死在监狱 26 名，死在押解和放回途中 30 名。”

“捕人过多的公社，造成混乱，影响了生产。口埠公社陈家生产队 42 户，捕了 6 名，群众反映说：‘捕去的都是整劳力，现在连个推车子的都没有了’。”[中共山东昌潍专专署公安处党组：《关于对益都县捕人的检讨报告》，《公安建设》，1960.8.23 日，58 期]

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多人，其中七百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监狱。对此，我将以专著介绍。

回目录

3、“始作俑者”与铁蹄下的饥民

据官方统计数字：1960 年春荒人口高达 12980 万（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1995 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 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5 年版]农村公共食堂普遍发生绝粮断炊，农村人口大规模爆发饥饿引发的各种疾病和死亡。春荒波及城市，

各大中城市和中小城镇也陷入严重粮荒，城市人口开始发生浮肿病、紫绀病、干瘦病和死亡。

就是在这样严重的局势下，针对彭德怀庐山上书中提及的公共食堂和人民公社等问题，毛泽东耿耿于怀，以其乌托邦的人民公社梦想为重，以其争胜好强、永不言败的个性为念，不顾全国各地上报和上书反映的粮荒、病、死现实，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恢复在前期调整中因粮荒而松懈的食堂，推动城市人民公社化，以期维护自己的权威。

1960 年春荒，全国各地一些公共食堂因断粮断炊，难以为继而停伙散场。

1960 年 3 月 4 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草拟的对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的批语中强调：要象贵州那样，坚持和办好食堂，“可以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 [毛泽东：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的批语，1960 年 3 月 4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

毛的意旨，通过党的系统迅速贯彻执行。3 月 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指示》，要求普遍推行农村食堂，争取全国农村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到食堂吃饭。

一场“巩固公共食堂”的运动，再次铺天盖地，严查农民“私自开伙”成为运动的要义。各地采取强硬措施，把农村人口再次逼迫进食堂。食堂缺粮断炊日渐严重，从中央到省、地、县委，要求社员吃野菜、草根、水藻、“稻草淀粉”、秫秸、薯藤……等等“代食品”！以达到“巩固公共食堂”的目标。这导致 1960 年春荒的病、死急剧增加。[余习广：《大跃进•苦日子历史启示录》，余习广主编：《大跃进•苦日子历史研究丛书》(3)]

更为甚者，面对大饥荒，毛泽东难以抑制“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激情，城市人民公社化进而纳入他的视野。

1960 年 3 月 8 日，他在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中写到：“看来，以大工厂、以街道、以机关学校三种为中心，而又有各种所有制（国有制，社有值，社以下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于一个公社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很好的。”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个大城市，也不要一个时期满街挂上人民公社的牌子（过去已经挂上者不取消）。但是一切有关城市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都应放手发动群众去进行，“慢慢挂上公社的牌子则是可以的。除这五个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则应一律挂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

《指示》下发后，全国各大中城市和城镇，迅速掀起城市人民公社化高潮，并迅速建立起城市人民公社。

时值严重春荒之际，粮食供应日趋紧张。城市居民被纳入公社体制后，食堂粮食定量日渐下降，营养不良和饥饿迅速扩展，城市人口大规模爆发因饥饿引起的各种疾病，死亡在城市蔓延。[余习广：《大跃进•苦日子历史启示录》，余习广主编：《大跃进•苦日子历史研究

丛书》(6)]

正是这场灭绝人性的“绝户征购”和“反瞒产”运动，造成了 1959 年冬荒连接着 1960 年春荒，全国各地农村爆发大饥荒，继之蔓延至城市；公共食堂绝粮断炊，公社社员缺衣少食，饥饿引发的浮肿病、干瘦病、紫绀病、肠胃病、妇女子宫下垂、绝育病、小儿疳积病、夜盲病、心力衰竭猝死等各种疾病，以及人口死亡空前规模大爆发。

中国大陆，濒临大饥荒引发的全面崩溃绝地。

回目录

五、大灾难来临后的应对：治国者与罹难者

更大饥荒第二阶段：1960 年 4 月～1960 年 11 月。

标志事件，即为 1960 年 4 月，农村“三反”整风整社运动～1960 年 11 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前。

1960 年春荒波及到城市，绝大部分城市发生严重粮荒，国库枯竭，口粮巨减；因饥荒引发的病、死情况，在全国城乡大规模爆发，尤以农村为重。为缓和局势，转移矛盾，安抚民心，针对干部作风问题，中共中央部署，全国农村开展起反“五风”、新“三反”、“整风整社”运动，“五风”干部成为毛泽东一意孤行导致大饥荒的替罪羊。1960 年夏收和秋收，农村的大饥荒一度出现短暂的阶段性缓和。

但是，在该年度粮食大减产的情况下，中央再次制定粮食征购高指标，各级干部再次“以粮食为中心”，开展高征购；全国再次普遍陷入大饥荒的灾难漩涡；为解决粮食问题，在生产自救的同时，一些地区的干部群众，开始（对）农业生产体制进行自发变革；中共中央也开始对对大跃进和庐山会议以来的政策，进行有限的退步与调整。

1、危机与转机

1960 年春荒，各地党政领导人严密封锁，或者习惯性地报喜不报忧。对于反映上来的灾情，也大多文过饰非，“形势大好”。

1960 年粮食实际产量为 2870 亿斤。

诚如毛泽东所言：形势比人强。当 1960 年的春荒，造成中国大陆大、中、小城市普遍粮食告罄，北京也陷入断粮危机之时，统治者再也不能继续坚持下去了。1960 年春荒，是毛泽东乌托邦梦断大陆之时，也是大跃进正式宣告破灭之际。

1960 年 3 月～4 月，沈阳、北京、上海等地先后上报中央，粮食告急，中央从各地紧急调粮，出现粮食随到随销的紧急状况。

5 月，粮食问题更加尖锐化，交通沿线的国家粮食库存基本挖空，调粮困难。

到 6 月上旬，北京市库存只够 7 天的销量，天津市库存只够 10 天的销量，上海市粮食部门已经没有大米库存，靠借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过日子，工业基地辽宁有 10 个城市库存粮食只够销八九天。粮食调出大省江西，省内南昌、景德镇、赣州、九江四个主要城市，也处于随调随销的危险境地。

5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称：“近两个月来，

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历史（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

同时，毛泽东在南巡中了解到，山东、河南发生了粮食紧张、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p1071～1073，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 12 月第版]

严重的危机，逼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正视现实。而在集权体制下，只有毛泽东的转变，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方向和六亿多中国人的命运。

回目录

2、“三反”运动与灾情披露

针对农村基层反映最为强的干部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问题，1960 年 3 月底，中共中央部署新的政治运动，开展新“三反”运动。

1960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上，批示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并“转发到县级各党委”：“在一些县、社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因此，提出整顿“三风”。

1960 年 4 月，全国农村大规模开展以整顿“三风”为目标的新“三反”运动。6 月以后，运动演变成为反“五风”，即反对和查处高指标风、浮夸风、共产风、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风和贪污腐化风（大多数地方又经常称之为生活特殊化风）。

各地运动的方式，先是“抓典型”，对于问题严重的地区，上级派出工作队（组），调查了解情况，向上做出报告；然后确定问题性质，由上级领导亲自发动“抓典型”，由上级工作队（组）蹲点，并发动群众，揭露问题，上报材料，由上级确定处理方案。

至 1961 年初，大部分问题严重的典型，领导人被调换，原负责人被做出组织处理结论。这场运动，高度调动了濒临绝地的广大农民情绪，对“五风”干部的控诉和揭批查运动，相当程度地缓和了社会矛盾，毛泽东决策的“三面红旗”造成的严重社会危机，被转移和限制在干部“五风”方面。[余习广：《大跃进•苦日子历史启示录》，余习广主编：《大跃进•苦日子历史研究丛书》(6)]

从 1960 年 4 月～1962 年 8 月，在全国农村开展的“整风”运动，“整风整社”新“三反”运动，“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民主革命补课”

等政治运动，为共和国史研究留下了重要的原始资料。

其中，尤以 1960 年 9 月～1962 年 1 月各地在运动中的揭发、检举、批判材料，揭、批、查会议发言纪录，各责任人的认罪书、组织处理材料之类，其内容空前绝后的真实可信和弥足珍贵。

在饥荒仍然蔓延，病、死仍然势不可挡的关头，广大农民对于控诉和清查大跃进以来干部作风问题，表现出具有对救生粮食同样高的关注度。

运动中，各地反映的情况揭露，这一时期，全国规模的大饥荒由暴力下的高征购与“反瞒产”造成，干部暴力逼粮，造成严重血案与粮荒。

运动中，各地反映的情况说明，由于前期“反瞒产”运动，干部以搜尽刮干为目的，将农村大部分粮食上交国库，并以暴力毒刑，直接造成大批死亡。1960 年的春荒，饥荒泛滥，惨案不绝于世，死亡大量发生。农民们在“三反”运动中，首要暴露的是严重的粮荒问题。

环江惨案是当年的典型。家家户户被翻箱倒柜，自留地的产品全被没收，社员“自行安排生活”。生产队的粮食交了国家征购，自留地的一点粮食也搜去交了国库，公共食堂停伙，环江农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停伙最长的驯乐公社，达 130 天；大安公社，停伙 115 天；就连环江县城所在的城关公社，也停伙 108 天。停伙时间最短的公社，也有一个月以上。

人们求援无望，上告无门，外逃无路。吃野菜、啃树皮、咽粗糠，难以活命，肝炎、浮肿、干瘦、子宫脱垂等病人不断增加，饿死人现象普遍发生。

据一份统计材料说，仅 1959 年至 1960 年，环江全县死亡 24000 人。人们试图按多年的平均死亡率计算，从中扣除一部分作正常死亡。

但是，据知情者反映，当时属于正常死亡的情况，只有一种，那就是对粮食有权支配的干部及其亲属；其他的人，即使到了自然死亡年龄，但导致的直接死因，也是因饥饿引发而死。

而省委工作队和县委上报中共中央的材料，先是报告死于饥荒的人大约在一万九千多，后来又上报说死难者为三万多人。这不包括因干部打死逼死的人数在内。据环江前县委书记王定说，他有一份当年广西自治区公安厅的调查材料：环江县在“苦日子”中因饥饿病死的人数，总计五万多人。应该可以认定，王定提供的这份因死人统计数字，比较可信。环江县在“苦日子”总计死亡人数，当在五万多人。

据环江县委的整风运动汇报材料：环江县 17 个公社中，两年饿死千人以上的有 9 个公社，饿死 400—1000 人的有 5 个公社。而上报中央的一份报告说，死人最多的驯乐公社，饿死了 2526 人，城管公社死了 2000 多人。城管公社的陈双大队，是洪华反“反后手粮”的重点，原有 800 人，死 234 人，占 26%以上。付点中山大队原有 1212 人，死 562 人，死亡率为 46.57%。驯乐公社康林大村的死

亡率也达 45.6%。整个自然村死绝，一人不剩的有水源公社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队的岩口屯。驯宁大队原有人口 640 人，死去 278 人，因而不能再单独立为一个大队，只好与太平大队合并。据对水源公社所死的 1706 人的情况调查，其中饿死的有 1500 人，斗争吊打重伤致死的 82 人，当场斗死 15 人，开枪打死 5 人，死绝 9 户，无依无靠的孤儿 94 人。

在这些地方，死人开始由生产队负责埋葬。后来死的人太多了，体病身弱的活人，抬不了那么多的死人去埋，只好各户自理，哪户死人哪户自己埋。那些家人大部分死了的户，死了大人剩小孩的户，尸首无人掩埋，有的停尸家里，有的死在门口，有的横尸村头。刚死人的时候还有棺材装，人死多了，没棺材，只好用竹席、杉树皮包着埋。后来死人什么也没有裹，光着尸体，挖个坑往里头一扔，甚至就往野地一扔，连埋也不埋了。失去主人的野狗，吃人肉都吃疯了，叼着人肢、人头满山乱跑。活人又想方设法打狗吃肉，人打狗肉的主意。环江大地，真是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回目录

3、“瓜菜代”与“偷青”保命

运动中，各地反映的情况说明，活下来的中国农民，是在春天野菜为食中渡过的。

在全国大粮荒中，中共中央屡次下发文件，一方面强调要“巩固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一方面要求各地区“要抓好吃饭的技术革新，搞好代食品生产”。（ ）

在“天下第一田”所在地麻城建国一社河北垸，1959 年春荒，群众吃的野菜，真能开博览会了：灰灰菜、地米菜、马齿苋、猪婆菜、鹅鹅肠，这些猪草，如今成了好吃喝。竹叶草、鸡叶草、车前草、水葫芦、野蒿子甚至茅草根、铁盘根草、各种树叶，这些猪都不吃的东西，人们拿来填肚子，还不容易采到手——饥民太多了！

当初人欢马叫参观“天下第一田”的“迎宾路”上，如今树叶捋得秃顶光，树皮剥得净净光。路边山坡上的油树皮全都剥光了——那东西有毒，人吃了泻腹拉肚子，吃多了中毒会死人。但饿极了的饥民也顾不上死活了。

1959 年春荒，麻城吃野菜毒死 83 人，中毒 2758 人。

在毛泽东“共产主义试点”的徐水，遂城公社社员在 1961 年整社运动中吐苦水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都叫吃光了“老鼠、长虫、青蛙、蝗虫、麻雀，差不多都叫人吃光了，野菜挖尽了，树皮剥光了，那牲口都不吃的‘营养淀粉’，

干部发下来还看人给，为吃这口饭，挨打挨骂都能忍，搞不好还扣你的饭。就这东西也捏着社员的命了！”

正因如此，1960 年春荒中，因吃野菜所谓“食物中毒”事件，频频爆发。

苍耳子是一种有毒的植物，初春萌发，叶肥苗大。饿了一冬天的饥民，一看到绿油油的野菜，许多人挖出来当粮吃，甚至有的人当时就往口里塞。因此，苍耳子中毒事件常有发生食物中毒，徐水一开春就中毒死亡 25 人。

3 月 29 日，老河头公社（今属安新）报告：因断粮停伙，饥饿难耐，长期采食树皮野草者达近二万人。此时田野中惟有苍耳子冒青，绿油油的惹人眼馋，大批饥民采食苍耳棵，26 个村先后发生大规模的中毒事件，中毒者千余人，其中 550 病患者被送往医院住院紧急抢救，死亡 4 人。事件发生后，中央和河北省保定地委有关部门领导赶赴徐水，组织现场救治。

1960 年 4 月初，河北省委报告中央，不到十天，徐水、邢台、宁普等 6 县及汉沽市 40 多个村庄，先后发生苍耳子中毒 2648 人，死 40 多人。从 1 月至 4 月，发生中毒事件 201 起，中毒人数达 8281 人，死 212 人。其中，食用野菜中毒 71 起。

1960 年 4 月，中共天津市委报告：4 月 9 日以来，宝坻无情、霸县发生误食苍耳子中毒事件，至 18 日统计，共有 14 个公社，131 个村，10336 人中毒，其中重病 284 人，病危 3 人，死 37 人。

1960 年 1 月～4 月，甘肃省委发出《关于发生中毒事件情况及防范措施的通报》，称：“据公安厅和卫生厅党委报告，今年一至四月分共发生食物中毒事件七十六次，中毒人数达二千六百九十七人，其中死亡一百七十五人。更严重的是中毒次数和中毒人数逐月上升：一月份四次，中毒十三人；二月份十三次，中毒一百四十六人，死亡二十四人；三月份二十九次，中毒四百二十一人，死亡七十六人；四月份三十次，中毒二千一百一十七人，死亡七十二人（四月份系不完全统计）。

（见余习广：《大跃进•苦日子历史启示录》，余习广主编：《大跃进•苦日子历史研究丛书》(6)）

那是怎样一个惨绝人寰的年代！饥饿、吃野菜食物中毒、浮肿、小儿痞积、干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紫绀、“非正常死亡”、人吃人……

在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四川、湖北、湖南、江苏、贵州、广西、甘肃……在“苦日子”的岁月中，人吃人事件曾大量发生！

回目录

4、大饥荒中官僚集团利益化与权力私利化

“三反”、整风整社、“五反”运动中，各地揭露和反映的情况说明，1960 年春荒，是中共权力性质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在饥荒、浮肿、死亡和保命的压力下，几乎是一瞬间，权力由社会整体目标，转向朝向权力者的利益集团化和私利化。

私利化的标志，为县级以下干部普遍“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普遍化；利益集团化的标志，为高级干部的特供和中级干部补助的制度化。

就在民众以野菜、树皮填充饥肠之时，各级干部普遍出现巧取豪夺，贪污腐化，吃香喝辣，奢侈浮华。中共中央将这一社会现象称为“干部特殊化”。由于办公共食堂，食堂又由干部专权，干部生活特殊化也源于食堂——干部普遍开小灶。社员饥肠辘辘，餐餐饿肚子。干部有权，就多吃多占。

庐山会议后干部队伍堕落到如此境地：贪污腐化，多吃多占，巧取豪夺，鱼肉百姓，只是为了危机中的生存本能。大跃进的理想主义，在他们心里也荡然无存了。

讲排场，摆阔气，大兴土木。干部特殊化，还特殊在置民众生死于不顾，利用特权，一心追求自身享受和淫乐。

在大饥荒同时的严重威胁下，1960 年 11 月，中共中央打破严格规定的计划经济统制体制，正式出台政策，决定对高级干部、民主人士头面人物和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实行定量供应优惠副食品。为此，在中央机关和国务院一些部委，定点设立起特供商店，供应当时极为短缺的糖、豆、肉、蛋、鱼、饼干等副食品，并从全国各地设立定点供应基地。从而，在全国人民以生命为代价，为治国者的治国方略造成死人如潮后果的时刻，中+以制度造就了特=权阶层的雏形。

1962 年初七千人大会后，国务院决定，将这种定量供应优惠副食品的特权范围，扩大到 17 级以上中级干部。规定：17 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补助供应糖一斤、豆一斤；13 级以上高干，每人每月增加供应肉 2 斤、蛋 2 斤。

对干部阶层的照顾，除了供应糖豆、肉蛋等副食品，还有其它的形式。在北京，“党中央决定举办 17 级以上党员干部学习班”，主要目的，一是“为了统一党内思想”，二是为了让干部得到营养补充。这种学习班带有“保养性质”，“每期两个月”，每天的饭食有“富强面粉的馒头、花卷，有大米饭，还有市场上少见的猪肉、鸡蛋和香肠等荤菜”，“每天的伙食标准一元钱”。[57]

各地也纷纷仿效中央，纷纷举办起干部学习班和轮训班。在灾情最为严重的四川、安徽、河南、河北、湖南、湖北等地，县以上干部以轮训的形式，到省委举办的学习班“统一和提高认识，改善生活。”

在“文革”初期，六十年代后形成的这种特权供应，成为造反派攻击“走资

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重要题材。

回目录

5、大波动与回头路

为迅速摆脱危机，恢复和提高农业生产力，在毛泽东态度出现松动后，中央一线领导人开始小心翼翼、继而加快步伐地进行政策调整，以恢复农业生产，解决粮食危机。

1960 年 7 月 5 日～8 月 10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并决定以后计划不再搞两本账，不留缺口。这标志着中共中央开始认识到大饥荒与高指标的直接关系。

在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农村生产队（即生产大队）为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五年不变，要死死地规定下来，再不讲三年五年从基本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所有制。他提出：要有部分人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有自留地，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这表明：至少在此时，毛泽东放弃了此前顽固坚持的“一大二公”公社所有制，和“兴无灭私”的“共产主义萌芽”立场，态度出现重大转变。

此后，各地相继取消了庐山会议后刮起的基本队所有制到基本社所有制过渡试点，并相继开始进行农业生产体制变革的探讨。

9 月以后，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各地得到落实，农业生产体制松绑，农村家庭生活恢复，农民能够享受在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中的劳动成果和危难中的相济濡沫，生产积极性自然提高。这一措施，对于缓和农村粮食危机，起到了根本性的刺激作用。事实上，新政策只是重新从庐山会议前的调整时期起步和前行。

9 月 30 日，中央批转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首次正式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战略转变。这标志着中共中央事实上正式放弃大跃进战略，而开始以求实精神作为中国社会解决危机，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国策指导。

在中央松绑的前提下，有前期调整的经验基础，广西、安徽、河南等重灾区为了克服严重困难，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率先进行生产体制变革的起步。

7 月 9 日，广西区人委会制定《关于农村的十项政策》，提出：（1）保证留足基本口粮；（2）节约备荒，粮食节余归己；（3）包产必须落实，超产奖励必须兑现；（4）给食堂拨够菜地，保证每人每天吃菜 1～2 斤；（5）鼓励生产小队开

发空隙土地，争取每人每年多吃二三十斤豆类和杂粮；（6）留足饲料、拨给青饲料地，发展集体养猪，建立养牛场，发展养牛；（7）留足自留地，实现社员家庭养猪平均每户一头；（8）多种油料作物，争取每人每日一钱油；（9）增加现金收入，争取按季或按月发工资；（10）大队掌握产品，迅速分配收益。这正是此前大力批判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当时也是走得相当远的变革措施。

然而，此件得到中央认可。9 月 8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该件，并在批语中指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要依照广西的办法，做出一些具体明确的规定，以便农村干部和群众共同遵守。批示还就时下流行的“共产风”指示：即使将来过渡到基本社有制，也不“社共队的产”，而是“队共社的产”，现在归基本核算单位所有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将来过渡到基本社有制时，仍归队所有和使用。这表明中共中央明确放弃了前期急于所有制过渡的指导思想。

10 月 7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次会议纪要，要求“彻底肃清‘共产风’”。

全国农村再次开始清算大跃进以来对农民的“共产”剥夺的“查账”运动，并先后进行以划分自留地、少量恢复家庭副业为中心的政策调整。

由此，重新获得少量自留地的广大农民，立即掀起了生产自救的耕种。在农作物能够生长的南方农村，冬季即见到成效。继之，少数地区进而开始了以多分田地给社员家庭耕种的土地制度改革试探。

回目录

六、渐行渐进的“让步政策”与刻意宰割的受难农民

大饥荒第三阶段：1960 年 11 月～1962 年 8 月。

标志事件，即为 1960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信》～1962 年 8 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前。

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即：

第一时期：1960 年 11 月～1961 年初；

标志事件，即为 1960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信》～1961 年 1 月，中央工作会议；

第二时期：1961 年初～1962 年 8 月；

标志事件：即为 1961 年 1 月，中央工作会议～1962 年 8 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即北戴河会议。

1960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正式放弃大跃进和庐山会议后祸国殃民的战略目标、方针、政策和手段，开始进行农业体制和政策的调整；此后，中央加快了政策变革的步伐，各地也为摆脱困境，开始积极探索农业改革的道路；一方面，为解救国家和人民于水火倒悬，中共中央一线领导人逐渐推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挽救农业的政策，并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推出了一系列涉及国民经济、城市、工业、教育、科学文化的政策，并逐渐收到起死回生，恢复国民经济和民生的良好效果；但另一方面，面对粮食连年减产、持续泛滥的严重灾情，中共中央采取了牺牲农民保城市、加大粮食征购的政策，并继续以大规模粮食出口换取外汇和黄金，从而加剧了 1960 年至 1961 年农村人口的受灾和病、死程度。

1962 年七千人大会，向全党正式宣告了毛泽东大跃进战略的破产，并提出了问责问题；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进，农村经济开始得到复苏，国民经济形势开始朝向好转，社会矛盾得到缓和。

但是，毛泽东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从农业变革开刀，扼杀了从农村改革引发的改革思潮和实践，重新将中国农村拉回和固定在其认定的人民公社体制中。在以清算农村干部问题，来转移对灾难根源和追究的策略主导下，继“三反”、“五反”、“社教”等运动之后，“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起彼伏；运动中进一步揭露出大量惨案，又为毛泽东所引导的政治运动提供了阶级斗争新材料。中国社会，开始被他刻意引向阶级斗争的危机漩涡，从而逐步走向新的险境。

回目录

1、改弦易辙的战略调整与锐意赴难的仁人志士

中共统制下的中国，是一个被政策制导的社会。国计民生、历史定位，一切皆依此为据。这是专制体制的特征，也是历史研究的前提。

中心问题还是恢复生产、解决粮食严重匮缺。

刘少奇是最早和最坚决表现出抛弃毛泽东的社会模式，拯救人民和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共最高领导人。

1960 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先后到河北、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地视察，了解情况。这次调查，他主要是向省、市、地一级的负责人了解情况。他发现在轰轰烈烈地"大跃进"表象后面，隐藏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一部分是自然灾害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不从实际出发，对生产力估计过高，计划指标过头，要求发展速度过快，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等造成的。但这时在多数领导人中，特别是一些高层领导中，对这些问题还没有清醒的认识，为此，刘少奇在多种场合下就这一问题发表讲话，以引起各级领导的充分注意。

6 月 10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召开的有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一些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刘少奇指出：最近半年以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了比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有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一方面，我们应该敢想、敢说、敢做，但是还要切实可靠，充分可靠，一切经过试验，实事求是，冷热结合。本来，去年庐山会议头一个阶段就想讨论这样一些问题的，想总结一下，得到教训，使以后这些事情减少一些，后来彭德怀问题一出来，这些问题丢到后边去了……这些问题的发生，包括中央在内，中央的计划偏大，盘子安大了，要求过急了，敢想、敢说、敢做我们大提倡，报纸上也大登，实事求是这方面就登得比较少，中央跟你们共同负责。这些问题不纠正，继续下去，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可以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次日，他又在该会上说：大搞基建，大搞水利，就是大搞积累，大丰收大搞积累，小丰收小搞积累，大灾荒少搞积累或不搞积累，这是客观规律。大灾荒还搞大积累是违反客观规律。在会议结束时他又特别强调：今后还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要着重了解实际情况，着重实事求是。

6 月 18 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指出：中央和各省、市在加强农业、真正以农业为基础的问题上是通了的，思想上有变化；但在基本建设方面还是不通，总是想多搞基本建设，不肯下来，急于多上马一些项目。这样下去，还是要继续被动。

8 月 10 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上又指出：至少最近几年要把农业摆在第一，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很有好处。总而言之，各方面都不要妨碍农业。

在刘少奇带动下，中共一线领导人和中共中央开始转变立场，回到务实救灾、恢复生产高于乌托邦教义的原则上来。

1960 年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紧急指示信》主要内容 12 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5%）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坚决实行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到堂（食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制度；开展整风整社等。

“十二条”是从多方面纠正庐山会议后农村政策的重要文件，是在仍然不去触动公共食堂这个毛泽东心中敏感神经前提下，走出拨乱反正第一步，农业政策回复庐山会议前的调整状态的重要步骤。这标志着在极其严重的困难局面压力下，在增产粮食就是解决危机根本出路的现实下，农村开始实行新政策。

随后，全国又以运动的形式，展开传达、贯彻《紧急指示信》轰轰烈烈的行动。按照中央的 12 月中旬前把“十二条”传达到全体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中去的指示，各省奉命召开从省、地、县到社、队的各级干部会议及社员大会，传达贯彻“十二条”。

但是，这样一个弯路的结果，是几千万人生命的代价，和对中国社会经年不息的大破坏！

1960 年 12 月 24 日～1961 年 1 月 13 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所有社队，都必须以“十二条”为纲，进行整风整社，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风（时称“五风”），彻底清算“一平二调”帐，坚决退赔。会议确定：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退赔“一平二调”账。国家拿出 10 个亿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拿出 15 个亿作为对“共产风”的退赔补贴；允许适当发展社员家庭副业和手工业，自留地由 5%提高到 7%；对农村集市采取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方针，目前要放手活跃农村集市。

上述政策，是正式宣告大跃进破产、中国社会必须改弦易辙的标志，是全面实行农业新政的改革先声。

1961 年 1 月中旬，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议公报宣布：“1961 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1 月 14 日～18 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李富春《关于 1960 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会议强调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适当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会议正式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十二条》，进行整风整社。全会还批准上年 9 月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六个中央局的决定。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会议，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转变，表明“大跃进”的方针实际上已经停止，国民经济转入调整的轨道。

八字方针的确定，标志着中国社会，正式摆脱毛泽东大跃进战略主导的困扰，揭开了战略转变、实行新政的第一页。此后，中国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以修复大跃进造成的社会破坏，修生养息，恢复国力与民生。

1961 年 3 月 5 日～23 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下，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农业六十条（草案）》突破了前期避讳的问题，正式否定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生产资料和主要生活资料公社所有的“共产主义萌芽”特征。提出：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生产大队所有制和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是直接组织社员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规模，都应该利于生产和生活；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是附属于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助手。人民公社应允许和鼓励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发展家庭副业，增加社会产品，补助社员收入，活跃农村市场自留地长期归社员家庭使用，其产品不算在集体分配的产量和口粮内，国家不征公粮，不计统购；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必须认真执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同时规定：公社各级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说老实话，严禁干部打人骂人和变相体罚，严禁用“不准打饭”，“不发口粮”和乱扣工分的办法处罚社员。

1961 年 3 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又一次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 60 条”），调整农村政策。在会上，刘少奇指出，“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之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的号召，要求各级领导深入基层，直接听取群众意见。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讨论并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

会后，刘少奇率先垂范，从广州直赴湖南农村，进行了 44 天的调查研究。这次调查，与上一次有很大不同。他 44 天中有 32 天住在农村，深入民间，深入基层，召开了数十个座谈会，就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直接倾听农民

的意见，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1 年 5 月 2 日～6 月 12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农业六十条（草案）》进行修改，同时制定精简城市人口、压缩粮食销量的办法，并对几年来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

会上，毛泽东在谈犯错误的原因时，强调是因为缺乏经验，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有待认识。他在会议上文过饰非地说：庐山会议的决议不应该传达到县以下，当时县以下应当继续贯彻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精神，继续反“左”。一反右，造成了生产大发展的假象。而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你违反了它（经济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社会主义谁也没干过……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他强调：一定要搞调查研究，要贯彻群众路线[《毛泽东文集》，第八卷，P276，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一版]。在他看来，灾难只是方法和经验问题。他明白：一定要回避自身的主导思想错误，否则，难以继续牢牢掌控全党的主导大权。

对于犯错误的原因，刘少奇的态度比较明确，注重讲“人祸”。5 月 31 日，刘少奇在讲话中明确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从全国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在主要原因。他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

“我们现在是来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他意有所指地说：农民饿了一两年饭，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也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刘少奇选集》，下卷，P337～338， 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一版]。

不言而喻，大跃进以来全党追随毛泽东的战略主导，造成如此大灾难的“人祸”。“再也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的前提，即为“再也不能继续”追随毛泽东。这是中共建国后，党内最高领导层第一次明确发出的清晰声音！此后，中央一线

领导人进一步掌控国家战略主导大权，脱离“三面红旗”的轨道，开始进一步推进休生养息的新政。

会议修定了《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其中，重要增订为：生产队是否办食堂，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取消供给制，社员一切收入都实行按工分分配；社员房屋，永远归社员所有。

会议决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 2000 万以上，本年内减少 1000 万，以压缩城镇粮食销量；将当年的钢产量指标由原定 1800 万吨，调整为 1100 万吨。

6 月 19 日，中共中央连续出台一系列改变指导路线的政策。

当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作重要讲话，阐述艺术民主、解放思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为谁服务、文艺规律、遗产和创造以及文艺领导等问题。同时，批评了当时文艺工作中的“左”的思想，阐明了党的文艺工作方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商业四十条》规定，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我国现阶段商品流通的三条渠道。要把过去撤销或合并的农村供销合作社恢复起来，把过去拆散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恢复起来，同时，有领导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手工业三十五条》规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手工业的主要所有制形式应是集体所有，前几年已改为全民所有制的，一般仍应恢复原来的手工业合作社或者合作小组。个体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和助手，应当积极发展城市家庭手工业，允许个体手工业者自产自销，自由支配个人的收入。

同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指出：只有彻底退赔，“才能恢复广大农民群众对党的政策的信任”。

8 月 23 日～9 月 16 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会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家计委等曾派出 11 个工作组到上海、北京、天津、太原等大中城市的工矿企业进行调查研究。会议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

《指示》指出：“八字方针”虽然已经提出一年多，但是，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能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以致调整工作不能有效地进行。我们已经丧失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必须退够。并指出，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今后三年内，执行这个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中共中央认为，“只有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才能建立新的平衡，才能逐步地巩固、充实和提高，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

济的进一步发展做好准备。”毛泽东在讲话中分析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

9 月 15 日，中共中央批准试行庐山工作会议上通过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这个条例，规定了高等学校的方针，任务和有关政策。指出，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条例规定：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对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应作适当的安排，但不宜过多；在教学中，必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坚持“双百”方针；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等。

9 月 16 日，中共中央将庐山工作会议上通过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发给各地各部门讨论和试行。《工业七十条》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提出整顿国营工业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主要内容是：加强企业的计划管理；建立健全各种责任制；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加强对企业的民主管理和监督；严格企业的技术管理、规章制度；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规定职工工资和奖惩制度等。

10 月 7 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 9 月 29 日再次提出的建议，发出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要各级党委就此问题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党中央作出决定。经过充分讨论后，翌年 2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即小队，相当于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样，便将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的单位统一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 1956 年高级社以来即已存在、而在人民公社成立后更趋严重的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严重的困难极大地教训了统治者。《农业六十条》和此前的系列文件，正式以制度的形式，对大跃进和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所主导的所谓“共产主义因素”的农村政策，做出了除“人民公社”名称外的系统清算和纠正。实际上，农村体制，恢复到高级社时期的规模和性质。这对于赢得民心，修生养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摆脱严重的粮食危机和社会危机，扭转农业和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起到了重大作用，成为中国当代史研究不可忽视的、最具价值的重要文献。

《农业六十条》传达后，各地采取措施贯彻执行，并先后解散了公共食堂。中国农村，步入了一个缓和修复的新时期。

各地也纷纷进行农业体制的大胆地探索。

这里需要提及安徽的变化。在大跃进中，曾希圣以极左和极狂热的姿态，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器重。

庐山会议及其后，曾希圣有极恶劣的表现。从而导致安徽省成为大饥荒的重

灾区之一，人口死亡在 500 万以上。

在巨大的灾情面前，安徽等地的农民自发性地搞起“生产责任制”，种起“责任田”。正是源于这场大灾难，饥饿的农民，开始了一场伟大的自发性变革。他们从绝地而起，自救求生，顶着杀身之祸，开始自发地实行对体制进行变通和改革：自留地、承包制、联产承包责任制，直至分田单干！而面对大灾荒，或是良知未泯、或是惊慌失措而以救生为上的一些基层及高、中、低层干部们，或视而不见，或默默允诺，或公然推荐了这种农业体制的变革。

面对现实，安徽省委和曾希圣很快转变了立场。1960 年冬，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他听到毛泽东说：“可以把高级社时期实行田间管理农活包工到户的办法恢复起来”。随后，他开始在安徽省开始大力推行“包产到户”和“责任田”，并在广州会议上三次向毛泽东汇报，得到毛的首肯。于是，安徽省放手推进“包产到户”和“责任田”。至 1961 年底，有 91.1%的生产队实行“责任田”。当年，安徽的粮食产量较上年度有明显增长。

更应该指出的是，就在苦日子时期惨案横流、万民涂炭的关头，在那迷雾蒙蒙的历史天际，血性男儿点燃起朝霞般鲜艳血红的理性火炬！一批又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们，拍案而起，奋笔疾书，奋力疾呼，反映灾情，呼吁变革！

历史的丰碑将永远记住那一群舍生取义为民请命的上书英雄们高贵的名字：彭德怀、李云仲、许学富、王万澄、张帆、明朗、钮惟新、蔡抚民、胡开明、钱让能、邓子恢、张闻天、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杨伟名、贾生财、赵振岗、樊印山……[余习广：《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上书者们仍然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直言国情之难，民生之患，抨击“三面红旗”的战略决策，直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干部强迫命令及违法乱纪风、干部生活特殊化，提出“联产承包”、“承包到户”、“分田单干，实行耕者有其田”等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和方案，疾呼放弃祸国殃民的乌托邦……

尽管其中许多人因此血洒荒原，但百万民众死于饥寒交迫的信阳事件等惨案，由此初露真相；为中国农村带来生路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初显端倪……

而中央一线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痛定思痛，决意幡然悔悟，以民生疾苦为忧，以饥荒死难为羞，力挽狂澜，解万民于水火倒悬，体察民生，顺应民心，顶着头上“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达莫克利斯之剑，毅然决然，在全国推行起“三自一包”、“四大自用”，并为此不惜牺牲了自己的前途甚至生命！

这场自下而上的改革之风，当年曾经风行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因此而挽大厦于将倾之际，挽狂澜于危亡之秋！中国，由此走出绝境；人民，由此而获得生机！

只是为八届十中全会的阶级斗争和反“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而剿灭。

与此同时，在“八字方针”的战略指导下，中共中央也着手进行了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战略调整。

回目录

2、“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和惊世血案

所谓“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发端于 1960 年冬的河南等地；1961 年 1 月以后，中共中央将之推向全国农村。历时长达 1 年左右。

面对举国为祸的大饥荒，从党内到党外，从地方到中央，有识之士开始纷纷提出责任追究问题。对此，统治者们各自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与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等中央一线领导人推行“八字方针”的战略调整，以挽救危机，救国救民相反，毛泽东的态度，是刻意转嫁危机，嫁祸于人，以推卸其“始作俑者”的责任。

面对举国为祸的大饥荒，如前所述，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将责任推向农村基层干部的作风问题。而干部执行政策，这一说法根本不足以服众。继之，毛泽东终于以其拿手好戏“阶级斗争”理论，将究责的锋芒，指向“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继而把解决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贪污腐化问题，引导上“阶级斗争”的歧途。

1960 年 12 月 24 日～1961 年 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前的 23 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插话中提出：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大体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间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 1960 年 12 月 23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 P110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据此，中共中央多次在文件中提及：全国按县、社、队，可划分为“三类”：干部多数是好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类；“干部问题严重，但政权还在我们手中”的二类；“权力为阶级敌人篡夺”的三类。

1961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向各省、部级党委转发《对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要求各地根据信阳地区经验，认真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所谓信阳经验，即是 1960 年 12 月 22 日开始，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和河南省委的指导，信阳地区以毛泽东关于“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

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精神为基调，全面开展针对严重干部问题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

信阳地委在“报告”中汇报说：“参加整风学习的各级干部十三万余人（其中：地专直两千余人，县直一万余人，公社一万三千余人，大队、生产队近十一万人）。对于一部分有罪行和有严重错误的人，已经集训了八千余人，特别集训五千余人，斗争和批判了的一万余人。有些罪大恶极民愤重大的已经作了初步处理，其中已经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九百八十三人，逮捕法办的二百七十五人。已经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个大队的领导权被夺了过来，正在进行夺取领导权斗争的有一千六百二十一个大队，其余大队正在积极进行准备，不久即可展开斗争。

“报告”提出：“信阳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内部肃反、社会镇反不彻底，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打着我们的招牌，进行大规模的最残酷的连续半年之久的阶级报复。”“敌人利用‘五风’进行破坏活动造成了部分损失；其余十五个县市都是三类，已经完全烂掉或者基本上烂掉，敌人篡夺了领导权。”“敌人打进来、拉过去的材料大量增加，暴露出来的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的现行破坏活动一天多于一天。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情况十分突出。”“报告”认为：民主革命的土改不彻底，是造成事件的根本原因。“光山县发现有二分之一的地区是和平土改，其中少数地区基本上没有搞土改。该县文殊公社梁栅大队土改运动只是走了走过场，基本上没有划阶级，全队四十七户地主、富农中，就有三十四户漏了网。这些材料说明了，信阳地区的问题是极端严重的，是敌人的大屠杀、大惨案，完全证明了毛主席指示的‘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就是信阳问题的实质。”

“信阳事件”造成骇人听闻的大惨案。据 1962 年 1 月，中共信阳地委《关于路宪文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罪恶的处分决定（草稿）》披露：1959 年冬、1960 年春，信阳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死人事件。据统计，全区死亡百余万，占全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三，死绝五万多户，村庄毁灭一万多个，牲畜死亡二十一万多头，破坏严重的地方，大量田地荒芜，房屋倒塌，十室九空，一片荒凉。

后据中共信阳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给中央和省委的报告，以及原中共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认罪书透露，在 1959 年冬～1960 年春的半年时间中，七百多万人口的信阳地区，饿死一百零七万余人，各级干部违法乱纪而至打死逼死八万余人……。

而因“阶级斗争”并不能解决信阳地区粮食匮缺问题，大饥荒进一步蔓延，人民群众的病、死日益恶化，至 1962 年秋收，信阳地区共计死于饥荒者，高达 180 余万之众！

关于信阳事件详情，我将以专著《信阳惨案全纪录》，进行全面地、系统地

揭露。

而信阳事件绝非唯一孤立的惨案，在“民主革命补课”和整风运动中，揭发批露出“五风”造成各地大量惨案不绝于世……

在“民主革命补课”或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先后以文件和转发的形式，披露出大量惨案：信阳事件、豫东事件、芜湖事件、阜阳事件、铜仁事件、遵义事件、聊城事件、临沂事件、自贡事件、临洮事件、高唐事件、高台事件、民权事件、福清事件、凯里事件、临潭事件、奉贤事件、湘潭事件等等重大惨案，震惊党内外。

当时，列入重灾区的山东、河南、安徽、湖南、贵州、甘肃、广西等省的大饥荒灾情，以及四川大饥荒及人口死亡的大致情况，也在这一时期，为各地上书所大量揭露。[详见余习广：《大跃进•苦日子历史启示录》，余习广主编：《大跃进•苦日子历史研究丛书》(6)]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后来部分地区发展为县以下基层和农村的夺权运动。

回目录

3、延续的残酷征购与大饥荒

经过大饥荒血的教训，1960 年夏收和秋收之际的中国农民，在偷青保命后，学会了“瞒产私分”。而中共中央在为了缓和城市粮荒的同时，还在不顾人命地提高粮食及农副产品的出口量。

1960 年夏秋，政府和农民展开了粮食争夺战。当然，失败方无疑是农民，付出的代价，只能是更多的生命！

9 月 20 日～22 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主持，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和北京五省市在北京召开农业书记会议。会议提出：要安排好农村人民生活，压低口粮指标，大种蔬菜，大搞“代食品”，办好公共食堂，提出“今冬明春给广大农民以修生养息的机会”。[《晋、冀、鲁、豫、北京五省市农业书记会议纪要》，1960 年 10 月。]

会议表达了中央领导人处理粮食危机的双轨立场：既想给农民“修生养息的机会”，又要压低农民口粮，保证城市粮食供应。

中央当时要求四川紧急外调粮食的立场和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

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 1959 年到 1961 年，四川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1961 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 231 亿斤，比 1958 年的 449 亿斤下降了 218 亿斤，甚至比 1949 年还少收 30 亿斤。[《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 年出版）]

四川大量往外调粮是 1959、1960、1961 年这几年。这正是四川粮食产量连

年大减产之机，但外调粮却连年递增。1959 年外调 49 亿斤，比 1958 年的 39 亿 6000 万斤增长 23.3%；1960 年外调 68 亿 4000 万斤，比 1959 年又增长 28.3%，比"一五"期间平均每年外调 30 亿 5400 万斤，增长一倍多。

周恩来、 李先念、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都曾对为调粮叫苦的四川领导人李井泉说过，现在全国形势如此紧张，要饿死人，也只能死四川人，而不能死北京、上海人。如果那样的话，国际影响太大了。[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在四川省县级以上干部轮训班发言记录》]这话在四川省高级干部流传中演绎成为口头禅：人死在四川的山沟里，总比死在王府井的大街上强。

结果，四川人民在这场大饥荒中，以官方出版物所载的 1959 年、1960 年的人口死亡率分别为 30.26‰和 22.32‰，且最终以付出 1250 万人的惨痛代价，成为大跃进运动的祭品。[《1950 年～1963 年四川人口及自然变动》,《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 年 7 月第 1 版]

1960 年，全国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只有 2877 亿斤，比 1959 年减少 530 亿斤，跌落到 1951 年的水平。而当年的粮食征购量高达 1024 亿斤，占产量的 35.49%。1961 年产粮 2950 亿斤，征购 809 亿斤，占产量的 27.424%。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在如此大灾之际，1960 年的出口量，竟然达到 53 亿斤，与丰收的 1958 年相等。按当年中央确认的人均 360 斤保命粮计算，可使 1 亿 4722 多万农民免于饥饿和死亡。

对此，我只能理解为：在决策者眼里，首先是毛泽东的面子高于一切；其次为中共中央所强调的否认大饥荒而增加出口，考虑的仍然是涉及他们面子的"国际影响"。铁的事实告诸历史：那是一个统治者面子大于人民生命的时代！

1960 年、1961 年的粮食征购，几乎就是 1959 年的翻版，只是少了以暴力挨家挨户搜粮的"反瞒产"！在"一大二公"人民公社体制下，农产品由公社支配，国家通过县级政权控制公社。该年的国家征购任务，通过县级下达至公社，国家权力直接施压于公社干部，只是免去了以大暴力对农民的环节。

在"先国家，后集体"原则下，1960 年夏收和秋收的粮食，大多采取了上年的"四就"措施：就地收割，就地征购，就地入库，入库封仓。

个别地方的基层干部舍身救民，实行"瞒产私分"，允许社员自家开伙；但是，其中大多受到严厉处理。

由此，1960 年冬季～1961 年春季，大饥荒以超过上年的势头横扫中国大陆广大农村，病、死潮再次铺天盖地。

河南、河北、山东、甘肃、贵州、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省，是这场再次以"四就"方式进行征购，造成大饥荒的重灾区。

贵州毕节县清水公社高山管理区的收割与征购是同步进行的:秋粮从 9 月初开镰收割，"到 9 月 14 日止，已收获脱粒粮食 19699 斤，其中：入国家仓 164019

斤，入集体仓 32900 斤。边收、边晒、边征购、边入仓。”即“入国家仓”占 80%，口粮、种子和牲畜粮占 20%。而“夏收粮食除完成公余粮任务外，剩下的由管理区（大队——笔者注）统一管理起来”。[周树芬:《关于毕节县清水公社高山管理区秋粮收获情况的报告》]

1960 年 9 月 15 日；毕节县普遍实行“边收、边晒、边征购、边入仓”。从而造成至 1961 年的大规模人口死亡。毕节惨案，惨不忍睹。

1961 年春荒，全国严重受难人口高达 21800 万，相当于 1949～1958 年各年平均值的 6.4 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1961 年 11 月 21 日，中共宁乡县委上报《关于粮食安排中的问题向地、省委的报告》。其中透露:1961 年国家征购粮食为 1 亿 0827 万斤，而当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 3 亿 818 万斤，尚若实现征购任务，则扣除种子、饲料，人平口粮则不到 250 斤。因此，《报告》对完成征购任务叫苦连天:“到目前为止，国家征购入库 8553.6 万斤，占应入库数的 79%”。但在安排群众生活中“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一部分地方粮食安排不下去，群众口粮低，生活过不去。其原因是原估产与实际产量有很大的变化。全县 66 万亩中稻和迟熟中稻，原估产平均每亩 350 斤左右，但实际产量每亩仅 300 来斤。而 35 万亩晚稻产量变化更大，原估产平均每亩 185 斤，现实际产量每亩只有 110 来斤，比估产少了 2300 多万斤。特别是产粮多的双江口、万寿山、回笼铺、双鸟凫铺等七个区，晚稻产量每亩只有几十斤。加上部分地区原分配任务偏高或灾情估计不够”，因此普遍造成征购后人民生活安排不下去。

产粮越“多”，上交越多，社员生活越发困难。全县每人负担上交国库征购粮 153 斤。宁乡有 42 个主要产粮大队，共有人口 36353 人，总产量 2147.9 万斤，共征购粮食 1408.59 万斤，征购粮占总产量的 65.6%，比国民党时代农民交纳地主的“四六租”，还要重（，）人平负担 387 斤，但种子、口粮、饲料粮共全部加起来只有 200 来斤，还达不到全县平均口粮水平。

其中负担最高的大队，平均每人负担征购粮 587 斤，最低的大队，平均每人负担 301 斤。这些大队完成征购任务后，没有种子和口粮的有 4 个大队。

双江口公社徐家大队，838 人，征购粮 47 万斤，平均每人负担 562 斤，完成征购任务后，只剩下 115368 斤粮食，即使不留种子和饲料，人平口粮也只有 138 斤。这个公社的洋泉大队，人口 1024 个，征购粮 60 万斤，人平负担 585 斤。不留一粒口粮，倒亏征购粮 35027 斤，人平倒亏 34 斤。社员反映:“人民公社哪里还有天理！我们农民天天种粮，比牛马还苦，种了一年粮食下来，自家一粒不呷，还倒欠国家的征购粮。如今咯个时道，就是要我们的命呢，人是冒得办法活下去了！不如死了倒好。”

还有 135 个大队，人平负担征购粮 300 斤以下，同时进行了征购减免。但即使如此，口粮也很低。麦田公社桂丰大队，687 人，征购粮 204142 斤，人平负

担 297 斤。经核减征购任务 90100 斤，征购粮为 114042 斤，人平负担 166 斤。而剩余粮食不留种子饲料，社员也只能分到人平口粮 150 斤，加上小自由 20 斤，人平口粮也只有 170 来斤。其它地方情况也大抵是交了征购，人畜缺食。

人民公社的结构，保证了国家对农业产品最大限度的掠夺和榨取，也造成（迫和）了社员群众饥寒交迫，大批病、死。

1961 年春荒，宁乡各食堂粮荒日重。县委和各级党委喊得最凶的，就是“低标准，瓜菜代”。全县各食堂通行 7 类标准：按年龄分劳力等级，以 16 两老秤，每人每餐由 1 两（不到市斤秤的 0.7 两）、1.5 两、2 两、2.5 两、3 两、3.5 两、4 两。最强壮的劳力，一天也只能吃到 12 两（合 0.75 市斤）。多吃没有，偷吃要罚。

而全国各地农村情况，莫不如此。

1961 年 5 月 17 日，李先念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区实在调苦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为降低。”［《李先念文选》第 259 页，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1957 年底～1961 年底，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四年。严重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山林毁弃，工业难以为继，城市陷入绝境，大饥荒如洪水猛兽，造成人口大规模病、死，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回目录

4、绝粮断炊与病、死新高潮

1960 年春荒～1961 年冬荒，大饥荒持续扩展，大规模逃荒事件，病、死事件，在这场新的大饥荒中空前爆发。

对于这两年准确的人口死亡数字，待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办公厅的有关文件开放后，我们将发现大量可信的材料。而现在，对于当年的逃荒与病情，则仍然有案可查。

当年，全国各地分级成立防病治病指挥部，专职统计病、死情况。择其一要，以窥其端。

1960 年 8 月 21 日，中共广西自治区委呈上《关于三级干部会议向中央、中南局的报告》。报告说，几年来粮食征购任务增加很大，使农民口粮大为下降，不少地方征购了农民保命线以下的口粮，造成全区浮肿、干瘦等病的人数达 100 万，非正常死亡达 30 万。其中曾放出粮食亩产 13 万斤高产卫星的环江县饿死

1.9 万人。自治区党委和人委采取抢救措施：（1）报经中央同意，减少广西部分粮食征购任务，并两次增拨各地灾区粮食指标 4100 万公斤，平均每人 10 公斤；（2）发动各地抓“瓜菜代”工作。至 2 月底，共种下瓜菜 253 万亩，抽 50 万劳动力建小球藻（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地大力推荐的“代食品”——引者），（3）8 月，拨 129 万元民政事业费，用于生产抢救病人的营养饼。拨小麦 150 万公斤，大米 50 万公斤，专供浮肿病人食用；（4）抽调劳动力，最多时每天出动 80 万人收集，制作代食品，一年累计生产代食品 3894.5 公斤，配给各灾民。这些措施，“有效制止”了粮荒及因饥饿引起的各种疾病的蔓延。

中共广西自治区委在大抓“代食品”生产中，又发明了“稻草淀粉”新花招，并以此作为生产 “代食品”的成绩，上报中共中央。所谓“稻草淀粉”，就是把收割下来的稻草，放入水中，然后倒上石灰，浸泡几天，用石碾压磨成浆，说穿了，就是当年人们用来拉屎擦屁股用的稻草纸（浆）的纸浆，让人当饭吃！美其名曰：吃饭技术革命！

饥饿使得人变成野兽，人吃人的情况至少在大饥荒的重灾区普遍发生。据我对大跃进•苦日子百县典型调查所掌握的情况，所到之处，大约 70%的县份，至今公安部门的档案中，仍然保存着吃人案的有关材料。

人吃人事件最为严重的地区，是信阳事件、芜湖事件、巢湖事件和柳州事件所在地及四川的一些重灾区。

在柳州地区的环江县、鹿寨县、石龙县（1962 年恢复武宣县建制），发生大量吃人的案件。石龙县不少地方发生因饥饿难耐的人吃人事件。三里、盘龙、东乡、二塘、河马等地，饥饿的人们趁夜晚出去刨坟，将新埋的死尸刨出来，剔下肉来拿回家去偷偷摸摸地煮熟了吃。

1960 年 5 月，卫生部报告说：“今春以来，据河南、山东、甘肃、江苏等 19 个省区统计，自今年 1 月～3 月中旬，已治愈浮肿病人 760 余万人，其中河南 122 万，山东 110 万，甘肃 15 万。各地治愈人数一般都占发病人数的 56-80%。对妇女病，河南、山东、湖南等 15 个省区共治愈子宫脱垂 93 余万人。大部分病人治愈后已参加劳动。如湖南已治愈的 92 万病人中，能完全参加劳动的有 73 万余人，占治愈人数的 80%。死亡人数显著减少。

但某些地区病情仍然严重，并出现了麻痹松劲的情绪。据 3 月底 18 个省、区统计，浮肿病 977 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劳动力，部分地区干瘦病人较多。例如，河南至 4 月中旬全省共计浮肿病人 128 万余人，其中干瘦病人 26 万余人；甘肃目前浮肿病人数约占全省人口的 30%，其中 63%已转入干瘦阶段。复发率高，江苏扬州专区浮肿病复发率达 30～40%，江都县丁伙公社联友大队，复发二、三次的占 60%。妇女病，据 13 个省、区统计共 477 万。卫生部甘肃工作组 4 月中旬汇报，甘肃闭经病占经期妇女 70%左右。小儿营养不良病占小儿总数 10%以上。

江苏淮安崔田大队，9 岁以下儿童消瘦、浮肿病发病率 18.4%，病死率 28.5%，但有些地区不重视妇女病及小儿营养不良。如浙江查出妇女病 31 万人，至 4 月中旬仅治愈 2.5 万人，小儿营养不良查出 5.7 万余人，治愈的仅 3600 余人。认为妇女病死不了人，小儿不是劳力。

1961 年春荒人口达 9770 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 1949～1958 年各年平均值的 2.87 倍。（ ）

面临断粮绝炊的绝地，1961 年春荒至夏收，农村人口发生大量死亡，活下来的人们，只有靠野菜、草根、树皮、“稻草淀粉”等“代食品”维系生命。

1961 年 5 月，国家主席刘少奇回到湖南宁乡县。在这里，他了解到大饥荒给乡亲们造成的苦难。县委书记何长有报告：全县人口减少五万多。为了解灾情，他拨开路边的人粪，只有草而没有粮。人们没有饭吃，吃树皮，吃稻草淀粉。路旁的树皮都剥光，怕上级来人看出丑，干部下令要社员在树干上涂了一层黄泥，然后用草绳裹住。

饥饿造成病、死再次大爆发。

1961 年 4 月 12 日，中共宁乡县委发出一份调查报告，反映了食堂绝粮断炊、干部克扣社员口粮，造成社员生活痛苦，辍耕停产，粮食断炊，而濒临绝境的情况：“该队 21 个食堂，仅只两个集体开餐，19 个农业食堂已完全和基本上垮了。黄杆竹山小队贫农陈朋发，53 岁，身体有病，因为食堂有煮饭，每天要到山上砍柴做饭，28 号在山上扒柴，不慎失足跌死（注：据查为饥饿发昏跌死）。特别是 30 号调查了杨家冲小队情况更为严重。该队 13 户（贫农 12 户，地主 1 户）40 人，男女劳力 17 个。由于前段粮食制度不严，数字不清，共亏损粮食 1080 斤。严重的是该队支部对此一情况不深入了解，抱着官僚主义的态度，克扣社员口粮，使该食堂从三月十二日起至三月二十七日止，整整 15 天时间无米停炊。40 个社员以搞小菜、野草、树皮充饥度日，生活极为痛苦。据初步调查了解，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第一、政治影响极坏，造成党与群众的隔阂。贫农洪大娘反映说：上面太不关心我们了。以前没饭吃还可以到左邻右舍家里借得到，现在饿尽的，连党也不借米给我们。由于没饭吃，17 个劳力在家睡觉，不能出工搞生产。贫农队长彭冬华，两口子都是全劳，半个月只借得半斤米吃了，无一点精神，25 号想到大队去搞点粮食来，走道路上就昏倒在三眼塘的巷子里。29 号去楼上拿牛草，又跌倒在地下。77 岁的贫农李宝洪，饿的不能度日，竟外去流浪十来天，跑了四个屋场，直到 29 号才回队。去年妇女陈里梅跑到娘家借米，花了两天时间，只吃了两餐饭。社员李国成说：什么三包、四包、再过几天就没得命了，连肚子都包不住。第二，严重影响春耕生产。应翻 83 亩板田，有 10 亩未翻；15 亩小麦，只培育得 4 亩，无一一类，估计亩产只 30 来斤，田里只积

一担土肥，连家肥也只收了 800 来斤。第三，影响了社会秩序。食堂被偷窃中稻谷 144 斤，食盐 90 斤，猪油 5 斤，棉油 1 斤 15 两及瓜菜所有种子。”［《关于月丰生产大队党支部存在严重官僚主义不关心社员生活，停发食堂口粮，影响春耕大生产情况的报告》］

1961 年 1 月 7 日，中共宁乡县委向地委和省委上报《关于当前农村疾病情况和组织抢治的报告》。《报告》说：“当前农村总的病情是很严重的，特别是某些后进社、队、食堂（？）的在发展。到元月 24 日止，全县共有水肿干瘦妇科小儿病人 56529 人，占总人口的 7.5%，其中主副劳力占 37000 多人，占劳力的 10%。尤其是水肿病，上升快，发展猛，现有水肿干瘦病人 19747 人，占整个病人的 34.9%。从元月 14 日到 24 日 10 天时间里，增加的有 10990 人，平均每天增加 1099 人。其次是重病危险病号增加，水肿死亡增加。现有重病和危险病人 4867 人，较前上升 35%，12 月以来全县水肿病死亡 1528 人，占病人的 8%，其中近 7 天死去 447 人，较前上升一倍，大大超过了正常的死亡率。个别地方由于疾病和死亡严重，已经破坏了劳动班子的劳动能力，影响生产活动。花明楼泉江大队竹冲生产队 250 人，病人 80 个，元月以来死去 14 人，其中董家湾食堂 40 人吃饭，病倒 20 人，18 号一天死去 3 人，7 个全劳力有 4 个水肿，3 个干瘦，连砍柴整米的人都感困难，根本无力进行生产活动。敬老院住 26 人，死去 9 个；临时医院住 16 人，死去 4 个，双凫铺麦田生产队，一月来死人达 1.6%。这队的杨家湾食堂王本立家 8 口人，死去 4 人，全是劳力，大崽 26 岁，水肿病死亡；二崽 22 岁，水肿病死亡；女儿 15 岁，错吃代食品死亡；本人 57 岁，水肿病死亡。这些个别地方的死人之风，已经使人心不安，士气不旺，生产生活都遭阻碍。

部分干部对人命关天的大事抱官僚主义的态度，不关心群众生活，没有认真执行上级党委的指示和措施……老粮仓红旗大队疗养院因生活安排不好，43 个病号跑了 37 个，剩下的 6 人因病中不能去，才留在院里。花明楼泉江大队干部住好房，病人住坏房，该队的疗养院住 10 间破茅屋，门无板，窗无纸，风吹浪荡，没有一个服务员，病人自煮自吃。没有医师住院，要 3 天去一次，有钱的吃药，无钱的就没有药吃。贫农社员周福六死在床上 3 天无人收尸。贫农周世成 18 岁，水肿严重，元月 17 日扶着棍去住院，因无人照顾吃不上饭，只好又扶着棍走回家去，就死在大队猪场旁边，三天无人收尸。

其次是克扣积压病人的营养物资情况很严重。花明楼粉铺大队 12 月份县拨给的 10 斤红塘，实到病人手中只 6 斤 14 两。公社给的 30 斤猪肉，实到病人手里的只 23 斤，其余都是医师和司务长吃了。西冲山大队总支书记唐福初到卫生所强买葡萄糖 8 支吃掉。白马桥公社去年 12 月份 110 斤红枣积压到现在才分到病人。分配不合理，珍珠大队 24 个住院病人。2 月份 40 斤糖果平均分配给食堂用了，实到住院病人只 14 斤。”

1961 年整风整社运动中，县委有一个统计材料说，因“五风”横行，口粮

严重困难，大跃进以来，全县浮肿、干瘦、妇女子宫脱垂、闭经、小儿痟疾病等轻重患者，前后累计高达 31 万多人次。仅 1961 年，妇女闭经、子宫脱垂者达 8 万多人！县委书记何长友向刘少奇汇报说，大跃进以来，全县饿死、病死人数为 5 万多人

1961 年，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情况大抵如此，民众苦不堪生。

据卫生部给中央报告：1961 年 4 月中旬，仅湖北省水肿、干瘦、妇女子宫脱落人数达 35.9 万人。江苏省浮肿人数达 12.6 万人。6 月，江苏省浮肿、消瘦人数达 89.2 万人。

1961 年 2 月 23 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报告》。报告中说："一九六 0 年以来，由于灾情严重，浮肿病由过去的局部地区逐渐发展到较多地区，从乡村发展到城市，从老弱发展到青壮年，目前除西藏未有报告外，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均有发生。目前，黑龙江、吉林、内蒙、上海等省、市（区）发病人数较少，河南、山东、甘肃等省甚为严重。发病情况虽有少数地区趋于稳定或稍有下降，但多数地区仍在继续上升。现有病人中，劳动力约占半数以上，并有百分之十——二十左右的病人已由浮肿转为干瘦，如救治工作不能很快跟上，则容易造成死亡。……根据各地调查，子宫脱垂病在北方约占现有妇女整、半劳力的百分之二左右，在南方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其中约百分之二十左右是十年以上的老病人。闭经约占生育年龄妇女的百分之三十左右，重灾区更达半数以上。……小儿营养不良病，发生人数也很多。这种病对于小儿体质发育影响很大，并且已经有一部分形成了干瘦病。由于营养不良等原因，小儿死亡率也较过去为高。"［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报告》，1961 年 2 月 23 日］

回目录

各位读者：因考虑到出版商对出书版权的要求，下面发简略本。

5、"瓜菜代"与农民保命战

生不如死的广大农民，终岁劳苦，粮食大部上缴国家，惟以野菜、"代食品"渡生，因此造成食物中毒事件在各地频繁发生。

卫生部汇报：1960 年春，各地公共食堂以野菜、"代食品"为主食的，已达 85%以上。

5 月，卫生部呈《关于各地发生中毒事故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今年以来

全国各地发生的中毒事件十分严重。据不完全统计，一至四月发生了中毒事故 2080 起，中毒 56788 人，死 2362 人。其中，农药中毒 938 起，中毒 20591 人，死 979 人；食物中毒 1142 起，中毒 36207 人，死 1383 人。今年第一季度中毒次数比年同期上升 15.2%，中毒人数上升 12.4%，死亡上升 86.5%；比去年第四季度中毒次数下降 13%，中毒人数上升 50%，死亡上升 32.5%。今年河南、河北、广西、四川等省中毒事故很突出，这几个省、区中毒次数占总人数的 55.9%，中毒人数占 47.5%，死亡占 50.6%。今年中毒事件同往年不同，公社食堂化后，一次中毒少者几十人，多者几百人，上千人，对生产和人民的健康危害甚大。

"3 月底以来，河南、河北、山西等省不少地方群众误将苍耳芽当豆芽采回，食后中毒 1 万多人，死 185 人，广西群众吃木薯不加浸泡消毒和吃有毒野果等中毒的 554 起，1444 人，其中死亡 547 人……"。

1961 年 3 月，卫生部报告：《食物中毒事件有所增加》。据反映，河南 2 月份连续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202 起，中毒 7043 人，死 67 人。许昌、新乡、南阳 153 起，食物中毒的分类是：硝酸盐 1793 人，死 13 人；食野生植物中毒 214 人，死 10 人；农药中毒 617 人，死 4 人；其他中毒 1851 人，死 10 人。

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大量农民铤而走险"偷青"，偷食未成熟庄稼。

1960 年～1961 年，"偷青私拿"，再次在全国蔓延，这也是造成严重减产的因素之一。而"偷青私拿"，继"反瞒产"后，成为社员与干部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晋南地委、稷山县委工作组在对 1960 年社员偷盗粮食的情况进行"解剖麻雀抓典型"后，向山西省委报告："太宁大队 502 户，2220 人，60 年粮食总产比 59 年减少 40%以上。去年秋收，发生群众性私拿私分，涉及各阶级、阶层，还有不少党团员和干部，连三五岁的毛孩子都向大人学会了私拿本领。私拿户占大队总户数 98.8%。贫农占本阶层 80%，中农占本阶层 92%，干部家属占占本阶层 15.9%。第一队 81 户，384 人，私拿户 74 户，374 人，有 5 户严重，每户都在 200 斤以上，其他 69 户平均在 30 斤左右。全队损失粮食 3330 余斤，全大队损失 2 万斤左右。若加上吃青造成的减产就更多了。拿粮之外，还拿菜、柿子、树木等。[60]

社员要活命，只有"偷青"；而干部为了"保卫集体财产"，抓住"偷青"的社员就以毒打和罚扣口粮惩罚。许多地区发生因"偷青"而大量打死人事件。

9 月 18，新华社《内部参考》在《部分农村基层干部违法乱纪现象仍然严重》中写道："广西从夏收夏种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从 6 月以来，有 37 个县和两个市发生打死、逼死人命事件 79 起，死 54 人，伤 53 人。多系大、小队干部和其他基层干部主持搞的。被害的多系有拿摸行为的群众。在 47 名被打死、打伤和逼死的人中，基本群众 34 人，占 72.32%；五类分子 9 人，地富家庭成员 4 人。

偷窃成风，全民为盗，只为活命。而干部则以暴力应对，矛盾无以缓解。

长期积聚的严重官民矛盾，正是毛泽东能以“反官僚主义”为名，成功将中国社会引向“文革”的关键所在。

回目录

6、全面调整中的缓步复苏与惊险倒退

第二阶段：1961 年初～1962 年 8 月。

标志事件，即为 1961 年 1 月，中央工作会议～1962 年 8 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即北戴河会议。

大饥荒时期，粮食是一切问题的关键，也成为新政策时期中共中央的工作中心。

至 1961 年，国库已被挖空，城市和工矿区的粮食危险。该年第四季度，中央需从各地上调 32 亿斤粮食，但到 11 月中旬，任务却只完成 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全面告急，断粮危险随时可能发生。11 月 10 日，中央召开会议，向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落实粮食问题。各中央局勉强订下 150 亿斤目标。

为落 1962 年粮食问题，缓解党内强烈的不满情绪，对既往历史和新的政策做出说明和阐述，1962 年 1 月 11 日～2 月 7 日，毛泽东主持，在北京召开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主要负责人，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

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报告对建国以来 12 年，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刘少奇脱稿讲话三个小时，他引用农民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

春节前后，会议进入毛泽东所说的“出气会”阶段，各省听取意见，由地委、县委书记们“出气”，春节后检讨，重点大多是粮食问题。

各省委作自我批评，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也围绕粮食等问题自我检讨。粮食部检讨说，1959 年全国粮食产量是 3400 亿斤，可是征购就拿了 1200 亿斤，占三分之一强，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还检讨说：1960 年本已出现全国大面积的饥荒，饿死人的情况已很严重，可是粮食部还自以为天下太平。全国出现大饥荒原因可能很多，但粮食征购过头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会上，中央领导人反复听取地方意见，把工业发展速度再调低一些，多进口

粮食，以缓解地方的征购压力。这减少了粮食征购任务，减轻了对农民的盘剥，客观上对复苏民生起到重要作用。

会议决定 1962 年再精简城市人口 2000 万，减少城市粮食供应，减轻粮食压力。

七千人大会，正式宣告毛泽东大跃进战略破产，并提出问责。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退居二线，中央一线领导人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周恩来等人改变了毛泽东路线，曾被批判的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地方明显增多。农村经济得到复苏，国民经济形势好转，社会矛盾得到缓和。

1962 年 2 月，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又称西楼会议。刘少奇批评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会议讨论了 1962 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国家存在大量赤字问题。会议确认：我国财政经济形势处在非常困难时期，必须确定一个调整恢复时期，以农业为基础，全面调整国民经济。4 月 19 日，中央决定陈云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统管财经工作。这表明中央以体制形式统管国民经济，脱离毛泽东直接插手。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提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通知》对纠正大跃进和庐山会议后，因坚持实事求是受到处罚的党员、干部，但同时对执行毛路线犯下罪行的干部也以"甄别平反"。

随着农村政策调整进一步落实，从 1961 年秋收～1962 年夏收，大规模病、逃、死情况逐步缓和。

1962 年春荒仍然严重。3 月，□□（？）部报告：《全国约有一亿人平均每天吃粮在半斤以下》。

报告说，全国农村人口约有 50%，即 2.5 亿人左右，平均每人每天吃粮半斤到 8 两；有 30%，即 1.5 亿人左右，平均每人每天吃粮在 8 两以上，广东、吉林、等省达到 9 两以上；有 20%，即 1 亿人左右，平均每人每天吃粮在半斤以下，大体分布在河北沧州和张家口、邯郸、唐山地区的部分地方，河南安阳、新乡、商邱、开封地区，山东德州、惠民、聊城，湖南常德、湘潭、衡阳地区，福建龙溪、福安、晋江、闽候，浙江金华、温州、宁波和嘉兴、杭州地区的部分地方，江苏苏州、无锡、扬州里下河地区，湖北孝感、宜昌、荆州，四川万县、涪陵、江津，陕西关中中部和西部的 13 个县市。

饥饿的人们，继续逃荒。

4 月 6 日，新华社《内部参考》报告：最近，河南、山东、湖北、河北、甘肃等省部分灾区人口外流有发展。据河南 3 月上半月的不完全统计，商丘、开封、

新乡、安阳、南阳、信阳 6 个专区外流的有 32 万人。开封近半月外出讨饭的有 13000 多人，比 2 月增加 2 倍多。山东德州、聊域、惠民三个专区，2 月中旬流到收成较好的南部地区的灾民，已由过去的 20 万人增加到 23 万人。甘肃有 75 个县、市发生人口外流，已外流 12800 多人，比去年 12（月）增加 7200 多人。贵州、四川群众流入广西、湖北两省、区的也不少。

报告说：最近陇海、津浦铁路沿线，有河南商丘、兰考、民权、开封、山东德州、惠民，及河北沧州等地的大批灾民，向安徽省宿专区各县流动。徐州、蚌埠之间的 27 个车站，每天上下车的人，平均有 2 万～2.5 万人，比平时多 4 倍。由于灾民流动量大，徐州车站每天上不去车的有 1 万多人，宿县车站仅 3 月 16 日一昼夜就有 8800 多人没上去车。许多灾民买不上票，就强行爬车。商丘车站从 3 月 10 日～16 日 7 天内，爬车者达 2.1 万多人。秩序很乱，经常发生轧死、轧伤人的事故，仅河南境内 3 月份就发生事故 20 多起。

至 1962 年秋收，全年粮食生产总产量比 1961 年增产 125 亿斤，其他经济作物也有相应增产和发展，全国已有 1/4 的县份，农业总产量恢复和超过了 1957 年的水平。

1962 年夏收后，粮食增产，农业政策放松，粮食问题开始纾缓。全国大部分农村，农民的吃粮水平大致接近 1957 年。[61]

至此，由于坚持调整和改变毛泽东大跃进战略，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中，渐次实行缓和社会矛盾的新经济政策方针，中国社会在恢复国计民生方面取得进展，危机渐行缓解。

回目录

七、国民经济恢复中的祸患再起与走向“文革”

大饥荒第四阶段：1962 年 9 月～1963 年秋收。

标志事件，即为 1962 年 9 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1963 年秋收。

1962 年 8 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提出被称为“社会主义时期基本路线”理论，大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农村改变“三自一包”；强力扼杀了这场起于大饥荒的社会改革运动，农村经济被严格管制于人民公社体制之中。

国民经济在举步维艰中继续调整，农村经济有所复苏；杭州会议制定了《前十条》，全国农村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处心积虑地一步步把中国社会拖进新的灾难，从农村起步的政治运动，成为最终走向“文革”的起点。

1963 年秋收后，中央实行粮食征购的“让步政策”，修养生息，取得成效，中国农村长达 5 年之久的粮食紧张状况得到基本改善，大部分病患者身体得到复原，全国范围的大饥荒基本结束，中国农村转入人民公社体制下的每年例行发作的冬荒、春荒常态。

1、毛泽东重新掌控权力制高点

1960 年下半年后，毛泽东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事求是”，讨论农业体制问题。但他限定范围，是在人民公社前提下，规模大小、所有制所属及程度、基本核算单位、干部作风方面的问题。对当时大有风行全国、涉及到所有制改革措施，毛泽东痛下杀手。

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大批安徽和曾希圣推行的“责任田”，全国一度迅速停止了农业生产体制改革的步伐，回归到毛泽东“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人民公社体制。但各地很快又出现回潮。

1962 年 9 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戴河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提出著名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还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上，毛泽东大批所谓“单干风“（即包产到户）、“黑暗风”（即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的客观估计）和“翻案风”（即中央对于大跃进以来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者的甄别平反）。

八届十中全会接受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从而在战略上开始步入二元结构，即经济上仍实行调整方略，政治上转入阶级斗争战略路线。

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国农村开始对各种生产承包形式和包产到户全面围剿。至 1962 年秋，对增产粮食、结束大饥荒、拯救农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曾发挥奇效的包产到户，终于被强行扼杀。

1963 年 2 月 11 日～28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问题，1963 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中小学工作条例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河北保定地区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毛泽东以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成功地再次控制了局面。

1963 年 3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运动。从此，继农村之后，全国城市也逐步开展"五反"运动。这标志着毛泽东正在有计划按部就班地实行其控制权力和战略的谋略。

1963 年 5 月 2 日～12 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提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

1963 年 9 月 6 日～27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村工作，1964 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着重讨论了工业发展问题。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规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抓住五个要点：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劳动，其中，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
此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步全面展开。

毛泽东运筹帷幄，终于成功地重新牢牢掌控大局。继"社教"、"四清"运动后，毛泽东以文化领域为突破点，一步步用政治运动绑架全党全国人民，最终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毛泽东时代画上终结号。

回目录

2、国民经济好转与农村政策倒退

1963 年秋收后，经过长达 5 年之久的大饥荒，中国社会出现转机，其标志性指标，是粮食形势出现了基本好转，农村生产力恢复到接近大跃进前的水平，农村结束大规模饥荒死人，大饥荒中病患者身体得到恢复。

1963 年，全国粮食总产 3400 亿斤，比上年增产 200 亿斤，比 1957 年 3700 亿斤相差 300 亿斤；净进口 89.238 亿斤。比 1960 年粮食增产 530 亿斤，征购量由 17.5%减少为 16.1%。农村人口人均吃粮由 1960 年度的 382 斤（原粮，合 267 斤贸易粮），增加为 1962 年度的 468 斤（原粮，合 327 斤贸易粮），(62)加上农民自留地出产和家庭副业贴补，以及家庭开伙的精打细算，农民生活大体得到摆脱饥荒的改善。

1963 年 3 月 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粮食工作和农产品收购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规定》。《规定》公示了 1960 年度以来的粮食征购情况和 1962 年度粮食征购的指导思想与计划：1962 年度预计征购 635 亿斤，比 1961 年度的 856 亿斤，少购 44（179？）亿斤。由于国家少购粮食，就使粮产区农民人均占有粮食有所增长，这对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此外，贯彻落实《农村工作六十条》自留地政策后，农民在自留地上精耕细作，就是这 5%～7%的自留地，担负了生产队分粮缺口的重要补充。至 1963 年，自留地普遍成为农民家庭生活所需粮食 20%左右、以及所需蔬菜 100%的补充来源。[63]

粮食增产，征购减少，家庭开伙，自留地补充，中央实行粮食征购的“让步政策”，修养生息，取得成效。

1963 年秋收后，农村大饥荒得到根本改善，饥荒新发的患病人数，下降到 50 年代中期一般水平，大部分病患者身体得到复原。六亿多中国农民，经过 5 年饥寒交迫、饿殍载道的煎熬，终于摆脱了大饥荒的苦海。

至此，全国范围的大饥荒时代基本结束。由于政策倒退，中国农村转入人民公社体制下每年例行发作的冬荒、春荒常态。

回目录

结 束 语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毛泽东狂热加诸中国社会的结果。1958 年 11 月后 9 个月的政策调整和随即的饥荒，已经证明了这种乌托邦癫狂的灾难后果。庐山会议，毛悍然发动“反右倾”和“更大跃进”，全党以暴力手段，将讲真话者打入“右倾反党”十八层地狱；在“反瞒产”名义下，将粮食高征购推向极端暴力化程度。

在这场大饥荒中，中国人民付出了 5500 万生命、至少 3 亿多人次病患累身、六亿多国人忍饥挨饿、国民经济濒临破产的惨重代价。毛泽东迫不得已做出让步。中央一线领导人改弦易辙，革弊兴利，调整战略，推行向农民让步、以增产粮食为目的的新经济政策。广大农民渐次得到休生养息，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元气。

然而，毛泽东以其集权独裁的绝对权力和权谋大师的机诈权谋，在反官僚主义、反腐败，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的旗号下蛊惑人心，终于强势打压了 60 年代初的变革势头。

大跃进·苦日子，是毛泽东走向“文革”的渊源所在。对于这段痛史的深入研究，其历史学意义在于：

“以史为鉴”，走出毛泽东，走向世界，我们需要有雄阔的视野和胸怀，我们亟需对自己历史真相的揭示和反思的精神与气魄。

对于这样一段骇人听闻、悲剧丛生的历史，我们的确应该告诸子孙，永誌不忘！

回目录

注释及资料来源

[1]　关于大饥荒死难情况的可靠材料，现公开者有：其一，四川死难者 1250 万人，见林雪：《我向中央讲实情——访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龙门阵》2006 年第 1 期；其二，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委领导人向他汇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安徽死难者 500 万人；另一说为三四百万，万里：“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见 1998 年 4 月 30 日《中国经济时报》）；原安徽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张恺帆在回忆录中说：大约有 500 万人死于那场大饥荒。

另：1966 年 11 月后，各地从省委、省政府办公厅、书记处，地委办公室和书记处“杀出来的造反派”，在揭发批判材料及大字报中，把大跃进•苦日子的灾情，作为“刘、邓资反路线”罪证进行揭发批判，引起广泛社会影响。我收集的 328 份这类资料，揭露出“李井泉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下的四川”，当年饿死 820 万人，这与成都团市委负责人廖柏康向中央汇报的死人数字 1000 万可以相互对照和参考；湖南死 380 万人，一说 400 万人；安徽死 486 万，一说是 520 万人；河南死 550 万人（省委上报中央为 180 万）；河北死 320 万人，一说 468 万人；广西死 360 万人（省委上报中央，1959 年下半年～1960 年上半年死人数字为 31 万）；山东死 417 万人；贵州死 248 万人。从四川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些数字和真实情况可能还会有出入。但毋庸置疑，知情人反映的情况，总比史学家从出生率到死亡率加减乘除出来的计算结果要可靠得多！

此外，书记处和办公室是中共系统运作中枢，大饥荒中各地定期汇报情况。1960 年 8 月至 1962 年 2 月的材料可靠性较高。待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办公厅材料解禁后，我们将获得可信数字。

[2]　该比例为作者根据接触到的 1960 年 4 月～1962 年初，各省、市、自治区和卫生部“防病治病”上报材料进行统计。

[3]　中国大陆所修该时期官史，对此基本上采用“三是论”，即：“《人民日报》是大纲，中央文件是中心，典型案例是装点（来源于中央文件）”。

[4]　大多数学者相关专著和文章，论证材料凭个别地区和个别典型。触犯了历史学孤证不立原则，是为史家大忌。

[5]、[19]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1958 年 1 月 11 日。

[6]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7]、[8]、[9]、[38]、[49]　余习广主编：《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时代潮流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 9 月第 1 版；[15]、[18]、[19]余习广：《梦魇的土地：1958 毛泽东徐水共产主义试点梦揭秘》，待出版。

[10]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 年 11 月 21 日。

[11]、[16] 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 年 8 月 19 日、21 日。

[12]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 年 5 月 8 日。

[13]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1919 年 12 月 1 日。

[14] 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庆祝中共成立 37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红旗》杂志,1958 年第 4 期。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p446~450。

[20]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纪录)》,1958 年 11 月 23 日。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P63,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第一版。

[23]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纪录,1958 年 11 月 9 日。

[22]、[24]、[26]、[34]、[40]、[46]、[56]、[59]、[61]、[63] 余习广:《哭天:大跃进•苦日子重灾区百县典型调查》。

[2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p71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第 1 版。

[25] 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 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年第 1 版。

[27]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几次的讲话(1959 年 2 月 27 日~3 月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8]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1959 年 5 月 7 日;中共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鸭鸡鹅问题的指示》,1959 年 5 月 7 日;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1959 年 6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一九五八~一九八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年 10 月第一版。

[30]　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 年 9 月 29 日；《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1955 年 3 月 3 日；即使在 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上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修改稿）》中，也强调在"我国农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

[31]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1956 年 9 月 27 日。

[32]　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中，中共自八大以后第一次提出："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

[33]　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个典型材料的报告"》，1959 年 10 月 12 日；《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

[35]　路宪文：《对中央和省委工作组的谈话记录》，1960 年 9 月；马龙山《我的罪行检讨（草稿）》，1960 年 11 月 15 日。

[36]　余习广：《伏尸百万搏天国：信阳事件全景揭秘》，余习广主编：《大跃进•苦日子研究丛书》（6）。

[37]　涪陵地委政策研究室 赵笃清、葛明琪、王杰军、石有斐：《一九五九年涪陵地区的"反瞒产私分"》，四川省农村合作经济史料"编辑组编：《四川省农村合作经济史》。

[39]　中国河北省委组织部：《吴桥县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情况》，1960 年 8 月 1 日。

[40]　中共山东昌潍专专署公安处党组：《关于对益都县捕人的检讨报告》，《公安建设》，1960.8.23 日，58 期。

[41]、[58]　1995 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 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5 年版。

[42]　毛泽东：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的批语，1960 年 3 月 4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

[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下，p1057～10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44]、[45]、[55]　余习广：《大跃进•苦日子历史启示录》，余习广主编：《大跃进•苦日子历史研究丛书》(3)。

[47]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P276，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一版。

[48]　《刘少奇选集》，下卷，P337～338，　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一版。

[50]　《晋、冀、鲁、豫、北京五省市农业书记会议纪要》，1960 年 10 月。

[51]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 年出版）。

[52]　中共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在四川省县级以上干部轮训班发言记录》。

[53]　《1950 年～1963 年四川人口及自然变动》，《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 年 7 月第 1 版。

[54]　周树芬：《关于毕节县清水公社高山管理区秋粮收获情况的报告》，1960 年 9 月 15 日。

[57]　《李先念文选》第 259 页，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60]　晋南地委、稷山县委工作组：《稷山县翟店公社太宁大队是如何解决群众性的私拿私分问题的》，1961 年 4 月 14 日。

[62]　辛逸：《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年版，p50。

回目录